

中日关系战略报告书（之八）

**冷暖交织：
新冠疫情持续下的
中日关系 2021**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2022年2月

目 录

一、引言	1
二、总论	4
总论一：变局与困局：中美战略博弈加剧背景下的中日关系.....	4
总论二：中日美关系：重审历史经验，探寻新时代进路.....	15
三、专题研究	23
专题一：2021 年的日本社会与中日关系管窥.....	23
专题二：日本政治：从安倍路线到岸田路线.....	31
专题三：日本战略定位的偏移与中日关系漂流下跌的风险.....	37
专题四：2021 年日本军事安全动向分析	45
专题五：2021：新冠疫情中呈暖色调的中日经贸关系.....	52
专题六：以 RCEP 为契机推进更高水平的互惠型国际经贸合作.....	58
专题七：日本经济外交： 重重挑战 审慎应对	64
专题八：日本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与中日数字经济合作.....	71
四、附 录	77
（一）课题组成员简介与分工	77
（二）几点说明	78

一、引言

伴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调整 and 变化，中日关系也进入多事之秋。特别是随着两国综合国力的逆转，既有及新产生的结构性矛盾集中爆发，两国关系一度跌入战后以来最低谷。

如若中日两国战略对峙的态势长期持续下去，作为一水之隔的世界一大一强的邻国，不仅彼此要耗费大量战略资源，成为国家难以承受之重，而且对地区乃至世界来说，也绝非福音。

在两国关系的至暗时期，双方的有识之士殚精竭虑，致力于寻求摆脱困境的良方。政治学者、曾获孙平化著作奖、时任复旦大学副校长的林尚立教授希望能拿出“复旦方案”。具体做法是打造中日两国专家学者交流的机制化平台，以共同撰写《中日关系战略报告书》的方式，在深入探讨交流、切脉问诊的基础上，拿出切实的建言献策方案，为两国关系的根本好转贡献政治智慧。

由此，经 2014 年尝试之后，自翌年始，由中日两国一线学者共同撰写的《中日关系战略报告书》次第展开。在中日关系的困难时期，这一合作方式本身即逐渐引起双方社会广泛注意。同时，为处于“现在进行时”的中日关系所做的及时、集中解读及其应有的方向性，做出了独特贡献。

2019 年秋，2014-2018 五个年度的《中日关系战略报告书》结集后，提交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现在审定中，敬请期待！相信这本凝聚了中日两国诸多专家学者心血的报告书，对于深切认识五年间发生巨大变化的中日关系，必将有所裨益。

这五年的中日关系报告书中，都包含有一个重要观点：即直面日益崛起的近邻中国，虽然日本在经贸领域总体上视之为自身在泡沫经济崩溃后从经济低迷期走向复苏的战略机遇，但在安全保障、特别是作为海洋国家的海上通道安全方面，却产生了严重的战略性疑虑和担忧。而且，这种疑虑，正逐步衍化成在战略上与中国相拮抗的日本的国策。而崛起中的中国所宣示和践行的和平发展理念，对日本来说，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印证。如何化解日本战略疑虑、防止其最终成为

“自我实现”的目标，就需要中日共同探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两国新的战略平衡点何在？两国根本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何在？对此，在持续深入的交流和共同探索过程中，不断积累共识，谋求新的历史条件下中日关系的长足发展，不言而喻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中日两国学者为《中日关系战略报告书》所做出的共同努力，正是这种尝试之一。

继 2014-2018 五年合集之后，2020 年 2 月，复旦大学又推出了第六个年度的战略报告书《中日关系 2019：新时代的入口与阈值》。遗憾的是，在报告书撰写的关键时期，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突然爆发，报告书未能邀请日方学者共同撰写。

2020 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天灾之外，特朗普政府使中美关系陷于深渊。虽然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尚未最终定型并会有所调整，但人们普遍认为总体不容乐观。而且，对中日关系而言，拜登政府的盟国策略不同于特朗普时期，必然会给“重回正轨”的中日关系带来重大变数。是年，中日两国学者再度合作、共同撰写的《2020：新冠疫情下的中日关系——非常态与新常态》正式发布。在对新冠疫情爆发后的中日关系进行全方位考察的基础上，揭示了“非常态”下两国关系所显示的若干新特点。鉴于中美关系的重大变化，报告书从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维度，用两个专章重点考察了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试图描述出“新常态”下中日关系的剪影。

2021 年，新冠疫情由于疫苗的广泛使用，较之 2020 年势头减弱。但由于病毒的变异，人类依然面临新冠疫情的严重威胁。受其影响，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人的直接交流受阻，国际政治更趋复杂。在此背景下，中日关系日益严峻，特别是中美博弈的加剧，使中日关系雪上加霜。但另一方面，中日美三国高层的沟通交流依然保持了畅通稳定；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期间，中日两国都有善意互动；特别是在经贸方面，新冠疫情下逆势而上，时隔十年再创新高。使 2021 年的中日关系总体上呈现冷暖交织的局面。

本年度的报告书，依然采取了由日本学者对中国学者所撰写的内容进行评论的方式。其间，两国学者“不谋而合”、“所见略同”的共识所在多有；同时，意见相左、甚至歧见很大之处也不鲜见。不言而喻，基于民族立场的单向性思维很难全面客观把握认识对象，只有换位思考才能有助于探求认识对象的本质。

在新冠疫情尚未终息的今天，特别感谢东京大学川岛真教授、庆应义塾大学

加茂具树教授及田岛英一教授、早稻田大学青山瑠妙教授、东京大学伊藤亚圣副教授等日本学者多年来为《中日关系战略报告书》所做出的贡献。对中国军事科学院江新风研究员、商务部研究院宋志勇研究员、复旦校友·旅日资深学者汪鸿祥教授、复旦校友·上海外国语大学武心波教授、日本新潟大学张云副教授的鼎力支持，表示由衷的谢忱！对著名日本问题专家吴寄南先生、原日本驻沪总领事和东京大学教授小原雅博先生、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上海事务所小栗道明所长、日本学者太田宏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张季风研究员、复旦大学校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蔡亮研究员等，在历年发布会上对报告书所作的精彩点评，谨表谢忱！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教授，对各年度《中日关系战略报告书》的撰写、发布以及结集出版等，自始至终给予悉心指导和鼎力支持；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苏长和教授，对报告书的结集出版惠予指导并玉成其事。对此，谨表敬意！

二、总论

总论一

变局与困局：中美战略博弈加剧背景下的中日关系

一、新冠疫情持续与中日美战略博弈的叠加

2021 年拜登总统执政后，重拾盟国战略，在因新冠疫情全球产业链调整、高新科技、以及所谓人权、民主等领域，对中国采取组合拳式全面打压方略。但在遭到中国有力反制之后有所收敛，中美关系也从所谓“自由落体式”下滑态势，趋于相对稳定。由此，于战略竞争中逐渐摸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美两国的根本相处之道以及两国关系新的平衡点，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与此相关联，在中日关系方面，相较于特朗普，拜登的策略和风格似乎更适合日本。因此，拜登执政下的日美同盟更趋活跃。而由于冷战后在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上日本与美国存在“错时”现象，也即先是日本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疑虑，对华采取“俯瞰地球仪外交”，倾全力制衡中国。但由于立意与现实相违且力有未逮，不得不改弦更张，策略性改变对华态度。在对华认知与相应举措方面，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其实在步日本的后尘，先是强势进攻，遇挫后不得不以守势重新思考如何与现今中国的根本相处之道，在新格局下寻求新的平衡点。在新一轮战略博弈中，我们看到相较于拜登在对华关系上有一定收敛的同时，日本政界反而表现出一种进攻性，日本右翼政客更不以前事为训，愈益肆无忌惮，给 2021 年的中日关系投下浓重阴影。

回顾 2020 年爆发并蔓延流行至今的新冠疫情，截至目前，不仅使全球 3.7 亿人感染、567 万人失去生命，也给国际格局持续带来重大影响。新冠疫情与中日美战略博弈加剧的叠加，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使中美、中日关系雪上加霜。

首先，美日部分政客将新冠疫情的“原罪”强加于中国。作为经济总量占据世

界前三的三个大国，在人类面临巨大疫情灾害之时，本应同心戮力为战胜疫情做出应有贡献。但美日一些政要将疫情政治化，通过“甩锅”、向世界卫生组织施压等手段，力图把中国诋毁成新冠疫情的源头，索取巨额赔偿等，以达到抹黑中国、损害中国国际形象的目的。不言而喻，这种将疫情作为政治工具的举措，毒化了中美和中日关系，极大地伤害了国民间感情。

其次，实施“脱钩”与嵌入所谓“价值链”。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各国适当调整供应链、产业链属正常之举。但美日两国政府却借机实施与中国“脱钩”政策，特别是将产业链意识形态化，强调其中的所谓“价值链”，也即以“经济安保”为名在全球产业链重组中排斥中国。这不仅给正常的经济交往人为地设置障碍，使新冠疫情中三国之间乃至地区与全球经济回复受损，也削弱了作为维系中日美关系的重要介质——经济要素的分量。这种冷战式思维与举措，势必给中美、中日关系带来战略性伤害。

第三，人文交流双重受阻。在政治外交、军事安保以及经贸等方面对中国进行打压的同时，美国又以各种理由对包括留学生在内的中美人文交流设置重重障碍，日本也有亦步亦趋的同调趋势。因为新冠疫情流行本身已经使正常的人文交流面临客观困难，再加上人为因素，中美、中日之间的人文交流与往日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这给中美、中日关系带来的伤害，是极其深远的。也使相互之间的国民感情愈发疏离与低下。

二、新冠疫情持续下中日关系的总体取向及其特征

（一） 战略矛盾深化：印太战略与新冷战的幽灵

首先，作为美日同盟框架下、以美日印澳为主要推进平台，以美国欧洲盟友为策应，集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价值理念为一体的所谓“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日渐成为日美广域、深度制衡中国的主要战略抓手。新冠疫情以来的两年中，日本两次政权更迭，美国也总统易位，日美新旧掌权者虽然执政风格不同，政治理念亦有差异，但在推展印太战略上并无二致。逐渐机制化、延伸化、多维化，可操作性强，其在软硬两个方面对华制衡战略网络的建构，其性质、规模和程度，在冷战结束 30 年间的国际政治中，亦属罕见。与此同时，国际政治中路径选择的惯性化特征，也正逐步体现在印太战略的推展过程中。一旦形成路径依赖，加

速运转的巨轮便很难停下来。以美日同盟为主要推手的这种大国角力及其边际与蝴蝶效应，不仅对中日美三国关系，也对地区与世界和平及人类福祉，带来深刻的战略性挑战。

其次，新冷战的幽灵。安倍晋三首相第二次执政以后，将所谓价值观外交作为日本外交的第四根支柱，热衷于建构“价值联盟”，但效果不彰。特朗普政府后期，在前期主要于经贸领域对中国极限施压外，又在意识形态方面针对中国出台了诸多极端举措。新冠疫情爆发之后，这一态势得到强化。而民主党拜登执政之后，以盟国战略为背景，首次策划召开了所谓全球民主峰会，甚至对北京冬季奥运会也进行“外交抵制”，并利用所谓人权问题，在涉港、涉疆、涉台等政治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日本政府出于日美同盟以及自身的考量，积极与美国相呼应。前首相菅义伟在访美时两国所发表的首脑共同声明中，其涉台言论触碰中日关系底线。岸田政府则新设人权问题首相辅佐官，以及经济安保担当大臣，甚至在文部科学省增设审查人文交流的审议官。而日本国会则在中国的春节期间，公然通过了所谓谴责中国人权问题的决议案。这些新冷战的作为，进一步深化了中日、中美之间的矛盾与对立。在全人类持续面临新冠疫情威胁，各国应该倾力合作、守望相助之时，这种以意识形态划线，以道德高地自居者的举措，其效果适得其反也是不争的事实。

第三，朝野合流、民意低下，修宪门槛阈值骤降。2021年是日本的大选之年，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自民党总裁选举，还是众议院选举，日本政治家都将中国问题作为助选因素，这说明中日关系的现状对日本国内的政治生态投射非常浓重。虽然在野党与执政党，以及在野党之间存在激烈博弈，除公明党之外，日本朝野政党在对华负面看法上的趋同性，说明中日关系的严峻性。特别是在日本国会通过所谓中国人权问题决议案的过程中，某些在野党甚至比自民党表现更为活跃。

新冠疫情持续中的2021年，中日两国国民感情没能收住下滑势头。据中日两国共同实施、“北京-东京论坛”发布的“中日关系舆论调查”显示，两国受访者虽然高度认同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对两国在地区合作以及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原则与议题关切上表现出高度一致性。但历史、领土与安全等三大问题对中日关系深层的心理影响仍然突出。有90%以上的日本受访者对中国持有负面印象，而66.1%

的中国受访者对日本持有负面印象，意味着中日两国的国民感情降至新低。

近年，日本政要反复强调中国“以实力改变现状”，刻意渲染日本所处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等等，意在以中国威胁论作为强军的口实，同时也为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做铺垫。按日本法律规定，修宪需要国会（众参两院）议员三分之二，以及国民投票的半数以上赞成。现今日本朝野政党在对华负面认知上的趋同，以及中日两国间民意的持续低迷，意味着日本跨越修宪门槛更具现实性，是值得十分关注的。

（二）沟通渠道与合作平台总体保持韧性

首先，虽然新冠疫情持续下的中日、中美关系更趋复杂，战略性矛盾与竞争总体呈加剧态势。但即便如此，2021年彼此依然保持高层及重要领域的沟通。如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之间多次电话与视频会谈，杨洁篪主任、王毅外长等与美国政要的多次会谈。而中日之间，10月4日第一届岸田政府正式成立时，习近平主席与李克强总理在第一时间表示祝贺。时隔四天的10月8日，岸田首相在新政权发端伊始，与习近平主席举行了电话会谈。在通话中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方赞赏日本新政府重视保持两国高层沟通，愿同日方加强对话合作，本着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精神，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当前，中日关系机遇和挑战并存。维护和发展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中日要认真汲取两国关系正反两方面经验，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切实践行“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妥善处理历史、涉台等重大敏感问题，管控好分歧，把握好正确方向，维护好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和大局。岸田首相在电话会谈中表示，以明年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为契机，共同努力构建建设性的、稳定的日中关系。

在两国结构性矛盾突出、纷争不断、对两国国民感情影响巨大的海洋问题方面，中日两国分别于2021年2月和12月举行了两轮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就继续开展防务交流、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对接验证，打击海上犯罪，加强海洋环保交流，在《中日海上搜救协定》框架下开展海上搜救联合演练，全面落实《中日渔业协定》等领域达成十余项共识。

其次，两国经贸合作逆势上扬。在全球新冠疫情的持续冲击下，各国经济以

及对外贸易遭受重创。2021 年，在中日两国的共同努力下，一方面经贸关系逆势上扬，另一方面机制化合作平台 RCEP 顺利推展，如期于 2022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据统计，2021 年中日两国贸易额为 3714.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1%，时隔 10 年再创历史新高。而随着 RCEP 的签署和正式生效，通过这一合作平台首次建立自贸协定关系，从而实现历史性突破。这不仅将对中日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有助于中日韩 FTA 谈判进程提速，以期早日缔结。同时，也为中国对接更高水平的国际经贸合作平台譬如 CPTPP 等奠定了良好基础，可以说是中日双方向更高层级的经贸协定努力的起点和桥梁。

总而言之，中日两国在战略层面，以及政治外交与安保领域，以中美战略博弈加剧为背景，2021 年继续走低，在涉台、涉疆、人权等问题方面对立激化。但逆势而上的经贸合作与 RCEP 的进展，使新冠疫情持续和总体走低的中日关系，呈现冷暖交织的局面。暖色调的经贸关系加之高层及关键领域保持互动，体现了中日关系内在的一种韧性。

综上所述，2021 年中美关系的变化具有象征意义。从自由落体式下滑到相对稳定，拜登政府全面出击打压中国遇挫后的有所收敛和审慎，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从积极意义说，是出于重新思考与中国如何相处的根本之道以及寻绎两国关系新的平衡点；从消极一面说，是暂停一下从而思考新一轮攻击波。这种现象，反映了美国对华认知和战略取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但这种认知和取向短期内不会改变。中美战略博弈正走入深水区，其后果会渐次显现。对其长期化、深刻化的发展趋势，应有充分的认识。

中美关系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会给中日关系带来深刻影响。未来的中日关系，总体上难言乐观。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

但另一方面，中日美三国之间，也存在战略利益与合作空间。怎样兴利弥害，寻绎三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以及三国关系新的平衡点，造福于人类世界，是对中日美三国政治智慧的考验。

三、展望与建议

2022 年，中日两国将迎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但由于左右双边关系的结构

性矛盾和美国因素的影响，中日关系很难出现戏剧性的转折和大幅度的改善。本课题组去年提出的，从“基于善意的、平实的两国关系”出发，将建构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落地到实处的观点，我们认为是切合实际的阶段性目标，具有现实意义。

第一，排除干扰，直接并同时利用各种国际多边会议机会积极进行多种形式的高层交往，就双边、中日美关系、全球治理问题进行战略沟通，拓展合作空间，减少和消弭战略疑虑，增进战略互信。

第二，在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之际，利用好包括重启中日两国间各种战略对话机制平台，就双边重要议题及时对话沟通，并就新出现的重大焦点问题，适时增设相关对话平台，最大限度保持正常对话渠道的畅通。同时，进一步强化和细化危机管控机制平台建设。

第三，利用好 RCEP 正式生效的开局之年，在拓展和深化中日经贸合作的同时，加快实现中日韩 FTA 进程。此外，以 RCEP 为抓手，一方面中国深化国内相关改革，同时期待日本以开放姿态，共同推动中国加入 CPTPP，在将多层次区域合作平台共同做大做强的过程中，实现中日两国共同利益的最大化，推动两国关系建设性发展。

第四，努力克服国内因素对双边关系的消极影响。如近年日本国会及执政党自民党政务调查会等的相关部会，与台湾民进党多次举行所谓“外交、安全对话”、“外交、经济对话”等。这种变相的官方往来，不仅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同时这一“打擦边球”的手法，也给两国政治互信带来严重伤害。此外，在信息化时代，中日两国还要致力于最大限度抑制和消弭国内褊狭的民族主义乃至民粹主义的网络政治暴力给双边关系特别是国民感情带来的消极影响。

第五，两国充分利用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克服新冠疫情困难，积极推动开展各领域、各层次的纪念交流活动，以期改善并增进国民感情。同时注意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如近年上海音乐学院的音乐史学家利用中日两国及其他国家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复原了保留在日本正仓院的公元 8 世纪左右经中国唐朝传到日本的丝绸之路各国的乐器，重现了那一时代的乐舞，不仅填补了音乐史的空白，而且印证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历史的源远流长。

最后，客观地说，直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日关系目前处于困难时期，而中美战略博弈的深刻化与长期化，也使未来一段时期的中日关系难言乐观。但我们一代学人仍怀抱理想，继续为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而努力。我们要做的，是致力于提高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深度，使之不仅知道对方之所作所为、所思所想，而且知道对方何以如此作为、如此思想。

2021 年的中日关系冷暖交织，总体虽大致稳定但仍呈下滑趋势。虽然 2022 年充满不确定性，但中日两国要利用新的一年各种机会之窗，共同努力，排除干扰，将建构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落到实处。比邻而居的两个大国，从根本上来说，和平共存之外的抉择，历史已经演绎得非常清晰明白。

日方学者点评

一、川岛真 教授

总论一的内容与日本对中日关系的认识差异不大,但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也有所不同。

第一,在美中的“竞争”之下,美国为了牵制中国,找同盟国建立五眼联盟(FIVE EYES)、奥库斯(AUKUS)、四国机制(QUAD)等小圈子,日本也参与四国机制。但是,这些“小圈子”都不一定有实体,刚开始也不过是阁僚会议而已,另外这些“小圈子”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模式也不清楚。值得注意的是,每一个“小圈子”都有目的,比如四国机制就是把印度拉进以美国为主的圈子的一个窗口,而奥库斯则是为了把英国拉进印太地区安保的举措。

第二,东亚的安全困境还在继续,互相提高军事能力以及积极推动军事活动。2021年,中国和俄罗斯的联合海军舰队航行津轻海峡,日本媒体都用影像报道此事,引起了日本社会的关注。其实,津轻海峡里有被指定为国际航行的部分,中俄舰队行经这一海域,并不违反国际公法。但是,因为日本社会有冷战时期的记忆,那时苏联远东舰队的军舰有时在此航行,给日本社会强烈的威胁之感。所以,对这次的中俄联合舰队的航行,日本社会的反应比较强烈。

第三,民意调查方面,言论NPO的结果表示,特别是疫情之下中国对日本的认识恶化了,日本对中国的认识并没有多么大的变化,显示了包括观光的“直接交流”的重要性。中日两国应该尽早恢复“直接交流”,不然的话,国民感情会更恶化。此外,疫情前后,日本对中国的认识不一定有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对中日关系的认识,依然有六成以上的日本人认为中日关系对日本“重要”。最大的理由是“经济”,经济依然是中日之间最重要的因素。

第四,在美中对立当中,美国一方面与同盟国建立安保方面的“小圈子”,以及在民主和自由等“价值问题”上召集国际会议,还在高科技方面要求同盟国采用同样的标准来对待中国。但是,美国也在气候变动、区域问题(朝鲜问题、阿富汗问题以及伊朗问题等)寻求与中国的“合作”。但合作的时候,美国不一定与同盟国一道,而是单独与中国交涉。所以美国的同盟国也都需要自己考虑与中国的“合作”方案。

第五，日本的岸田文雄内阁对中日关系的立场，比菅义伟内阁要积极，明确提出对中国进行“是是非非”的政策，摸索跟中国的“合作”。但是，目前这一“合作”的内容还不清楚。2022年中日关系的课题是在如何建立、恢复“直接交流”的同时，找出“合作”的内容。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应该是为中日关系的改善提供了一个好的契机。

二、青山瑠妙 教授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每年都定期观察日中关系，在把握日中关系的变化和持续性方面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2021年版也是汇集了重要论点的优质报告书。

拜登政府上任以后，提出了对华抑制的政策。美国的这些政策彻底改变了围绕日本、中国和中日关系的地区环境。今年的报告书便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变化，选取了正中靶心的标题。

总论一对2021年的日中关系进行了综合评价。与以往的基调不同，这篇报告书对中日关系提出了严峻的看法。由于日美两国将新冠问题政治化、在经济领域实施脱钩政策，以及与价值观挂钩的战略、学术和人文交流层面的各种限制，中日关系面临着困难局面。总论一指出，在这样的形势下，中日战略冲突因素加深。在第二届安倍政府的领导下，日本推进价值观外交，执政党与在野党在对华认识上逐渐趋于一致，国民感情持续恶化。但与此同时，两国高层交流渠道通畅，经贸关系牢固。

的确，拜登政府的政策在中日关系中引发了许多让人联想到冷战时代的问题。然而，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是，当前的中日关系有着牢固的经济联系，虽然因新冠疫情暂时停止，但民间交流的根基深厚。由于国际形势等结构性因素，中日之间的政治和安全冲突较为突出，但经贸关系和社会层面的交流与合作稳定了中日关系，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比总论一的总体评估更为乐观。

总论一提到的改善中日关系的建议，每一个都很重要。改善中日关系、构建双边互信关系在任何时代都不容忽视。利用RCEP框架，通过中国加入CPTPP加强中日经济关系也是不可或缺的措施。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通过对话解决问题”对增进两国的稳定关系至关重要。本章最后指出，“比邻而居的两个大国，从根本上来说，和平共存之外的抉择，历史已经演绎得非常清晰明白”，可以说是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之际的警句。

三、加茂具树 教授

2022年正值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两国关系迎来重大转折点。《冷暖交织：新冠疫情持续下的中日关系2021》所收录的各篇论文都阐释了重要的论点。

然而，日中关系的现状或许比“冷暖交织”一词更为严峻。2007年以来，日本历届政府都采用“战略互惠关系”这一概念来阐述日中关系，该概念同样被用于2013年日本内阁通过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但是，现今的日本政府——岸田内阁却未采用这一概念。这暗示了日本政府考虑不再将当前的日中关系简单地定位于过去的延长线上。2020年及2021年发布的日本《外交蓝皮书》都未使用“战略互惠关系”一词。2021年12月，岸田首相发表施政演说，围绕日中关系的发展方向，他表示要“构筑具有建设性且稳定的关系”。

如《总论一：变局与困局：中美战略博弈加剧背景下的中日关系》所述，尚未看到2022年中日关系大幅改善的势头。在日本国内，明确存在一种观点，即“日中两国为维护区域与世界的长期和平繁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正因此，一些人认识到，日中关系的稳定是必要的，两国间的对话不可或缺。尽管如此，如本报告反复指出的那样，日本国内的对华认知并未得到改善。

日本国内对华认知未能得到改善的主要原因在于，对中国对外行动的担忧。中国的国力随着经济的急速发展而增强，对此，日本国内的普遍观点是，“中国是能对区域力量的分布产生影响，牵引东亚地区国际政治力学变化的存在”。结果导致，日本对中国的主要关心集中于中国将如何使用自己强大后的力量。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的成功为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中国发布了如下方针——“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对于愿意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的中国的登场，日本也应表示欢迎。

另一方面，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国力增强的中国正在成为促使国际秩序变化或曰国际秩序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前者是对中国的期待，后者则是对中国的担忧。

问题是，近年来日本对中国的担忧正在进一步加剧。其原因在于，日中两国为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而于2008年确定的《日中东海问题原则共识》没能得到实现；并且，中国试图凭借实力来改变东海海洋秩序的行动（如中国海警）近年愈发频繁，此外还有人民解放军在台湾海峡的行动等。

随着中国国力的壮大，中国对自身的认知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也加深了日本国内对中国的担忧。近年，中国自认为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取代美国，只是时间问题，甚至指日可待。

对于中国自我认知的这些变化，日本国内的反应颇为敏感。所谓“反应”，是担心作为大国的中国没有明确地说明如何使用自身的权力。而大国是能对世界和平问题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力量。因此，日本社会希望，对于今后如何构筑权力、如何进一步强化权力，作为“大国”的中国能够做出说明。

《冷暖交织：新冠疫情持续下的中日关系 2021》所收录的各篇论文都明确指出，日中两国之间的对话不可或缺。对此，我极为赞成。我认为在对话中，以下的一些讨论要点必不可少：

第一，关于对本国和平和繁荣而言所必需的国际秩序，日中两国间的认识是否一致？

第二，日中两国的共同利益是维持两国关系稳定的动力，这一共同利益何在？

第三，对于对方所期待的发展方向，两国是否存在共同的理解？

50年前恢复邦交正常化时，日中两国在外交战略上存在共同的利益。50年后的今天，到了日中两国重新确认何为两国外交战略共同利益的时期。通过《冷暖交织：新冠疫情持续下的中日关系 2021》，我们加深了对此问题的认识。

总论二

中日美关系：重审历史经验，探寻新时代进路

战后以来，中日美三国经历了两次建构战略大三角关系的过程。上世纪 70 年代，美国对中国实行接触政策，尼克松访华，发表“上海公报”。以此为背景，中日迅速实现邦交正常化。由此，中美日三国第一次建构了战略大三角关系。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通过“老布什-斯考克罗夫特式”的危机沟通模式，中美日第二次建构了战略大三角关系。

2021 年，美国和日本均迎来了政府轮替和权力交接。1 月 20 日，拜登就任美国总统。10 月 4 日，菅义伟内阁辞职，岸田文雄就任第 100 任内阁总理大臣。目前的中美日关系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如何借鉴历史经验，正视现实挑战，重塑中日美战略关系，是值得探讨的重大议题。

一、国际协调主义：中日美战略大三角关系的建立、重构与发展

上世纪 70 年代，中日美三国基于联合抗苏这一共同战略利益，第一次建构了战略大三角关系，加强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协调合作。

上世纪 90 年代初，通过“老布什-斯考克罗夫特式”危机沟通模式，中日美以经济贸易的共同战略利益为基础，第二次建构了战略大三角关系。1989 年 7 月，为了在西方世界制裁中国的困难时期维护中美关系，老布什总统开展“秘使外交”，派遣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斯考克罗夫特将军作为总统特使秘密访华，把邓小平提出的“解铃还需系铃人”原则带回华盛顿。1990 年，美国逐步解除对华制裁，中国重新融入世界，实现了中美建交以来最成功的一次“危机解套”。日本则如同 1972 年在尼克松冲击下先于美国与中国恢复邦交一样，再次发挥先行作用，1991 年 8 月 10 日，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访问中国，成为当时西方大国中第一个访华的政府首脑，推动了中日关系的改善。

冷战后，美国对中国实行干预主义的接触政策，希望在确保美国的政治、经

济、技术优势的同时，将中国纳入国际社会秩序，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三届政府长期持续接触政策。另一方面，冷战后，为防止日本“战略漂流”，美日两国相继签署《美日安全保障共同宣言——面向 21 世纪的同盟》、《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等一系列文件，以及五份“阿米蒂奇报告”政策建议，美日同盟由过去关注“东亚事务”发展成为“世界中的日美同盟”，从原来日本单边依赖美国发展到美日相互依赖、乃至相对平等的结构。与此同时，在对华政策方面，从牵制为主的接触战略逐步转向接触为主的牵制战略。

2017 年特朗普上台，他认为美国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不再是恐怖主义，而是大国竞争，特别是中美竞争。自尼克松时代以来长达 40 余年的对华基本政策被彻底颠覆，中美关系以及受此影响的中日关系再次走到十字路口。

二、拜登政府的“国际协调主义”与中日美战略关系的再建构

2020 年爆发新冠疫情后，出现了短暂的由传统国际协调主义向新国际协调主义转变的迹象。其重要特征是，由于特朗普政府坚持“美国第一”和单边主义，忽视与西方盟国的关系，缺乏维护世界秩序的意愿，很多国家呼吁“新国际协调主义”，希望在公共卫生、电子商务（数字贸易）等领域继续加强国际协调。日本与欧洲等国寻求发挥“第三方力量”，希望填补因特朗普政府不断从国际组织“退群”、淡化美国领导世界意图而形成的力量真空地带，等待美国力量的回归。

2021 年初拜登执政之后，美国回归传统国际协调主义路线，强化盟国关系，希望恢复美国作为领导者的全球声誉和有实力、可信赖的国际形象，但是遭遇很多挫折。例如，美军在阿富汗混乱撤军后带来诸多问题，新冠疫情持续恶化导致美国经济严重停滞，与法国围绕向澳大利亚出售英国核潜艇问题发生重大摩擦等等。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提出建立“美日新时代全球伙伴关系”，强化美日同盟，特别是强化美日海权同盟，增加了中日两国解决海洋争端的复杂程度，导致“中国安全形势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增加”。拜登政府执政以来，中日海上冲突出现新变化，中日之间“冷和平”的平衡态势正在受到挑战，日本对中国从暧昧平衡走向公开对抗。具体表现为：1、中日海上冲突程度加剧。2、中日海上冲突区域扩大，出现东海、南海、台海“三海联动”，甚至“美日要一同防卫台湾”。3、中日

海上冲突的影响加深，美日澳印英法、东南亚等国对中国进行不同程度施压等等。

另一方面，中国加强了海洋治理，如颁布《海警法》，全力推进海洋生态环境建设。4月26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发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地形地貌调查报告》等，加强了中国对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诉求与法理依据。

由此可见，在拜登政府回归传统国际协调主义——当下的主旨是针对中国的盟国战略——的框架下，中美日关系走向“竞争-合作-对抗”共存的样态。其中，尽管中美两国存在战略竞争，但亦不能以“竞争”来定义全部中美关系，因为中美同时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

因此，在2021年，美国希望缓解日趋紧张的中美关系，与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沟通与谈判。例如，3月18-19日，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Anchorage）举行中美高层会晤，尽管中美没有能够“破冰”，双方进行了“艰难而直接的”唇枪舌战，但也是“坦率的，建设性的，有益的”沟通，表达了各自的诉求和政策关切。7月26日，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Wendy Sherman）访问天津，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峰举行会谈。9月2日，美国气候特使克里（John Kerry）访问中国，就气候变化问题同中方进行接触。

与此同时，中美两国也频繁进行高层对话。9月10日，习近平主席应约同拜登通电话，进行了自拜登上任以来的第二次电话交谈，围绕经济话题、气候变化以及新冠疫情等广泛交换意见，进行了“坦诚、深入、广泛的战略性沟通和交流”，提出“避免误解、误判和意外冲突”，并推进在其他议题上的协调和合作。习近平主席表示，“美国采取的对华政策致使中美关系遭遇严重困难”，如今国际社会面临很多共同难题，中美应该推动两国关系尽快回到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造福两国人民”。拜登表示，两国没有理由由于竞争而陷入冲突，美方从来无意改变一个中国政策。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瑞士举行了会谈，双方同意落实9月10日两国元首通话精神，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杨洁篪表示，中方重视拜登总统近期关于中美关系的积极表态，反对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沙利文则暗示了美中关系的缓和基调，强调美国正寻求与中国共存，而非遏制中国或发动新冷战，拜登政府不试图改变中国的制度。10月31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和中国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意大利会面，再次表示了管控分歧的意见。王毅提出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布林肯也强调了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至关重要，希望负责任地管理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激烈竞争，建议两国可以在朝鲜、伊朗、缅甸、阿富汗和气候等问题上合作。

在拜登的外交安保团队中，国务卿布林肯认为中美在竞争之外，也可在气候变化、防扩散、全球健康等方面合作。此外，2021年12月，作为印度洋-太平洋事务协调员的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提出防止“中美关系直线下坠”的设想，建议中美可在疫情防控、气候变化等领域展开合作。现任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早在2019年与坎贝尔在《外交事务》¹撰文，认为中美战略竞争不可避免，但在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上仍有合作空间。

2021年，随着疫情持续蔓延以及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日益激化，日本对美、对华政策进行调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战略主张。其中“对华融和论”在坚持日美同盟作为安全保障基轴的同时，强调以经济为中心继续改善日中关系。另一种主张“对华强硬论”，指责中国的所谓香港问题、人权问题、钓鱼岛维权执法问题等。无论是“对华融和论”，还是“对华强硬论”，均认识到日本已经深深地陷入中美战略博弈的夹缝中，并倾向于不应在与美国保持同步的同时，过度加深与中国的对立。

三、前景分析：实力、规则、模式的竞合逻辑演绎

如上所述，2021年拜登执政后，中美关系仍然持续紧张，但中美双方均有意愿管控危机。另一方面，岸田文雄接替菅义伟出任日本首相，其外交政策继续坚持强化日美同盟，同时强调要建构“稳定的中日关系”。今后，中美竞争合作、中日竞争共存将常态化。

从历史经验来看，中美关系屡屡出现危机的“尖峰时刻”，例如1989年美国带领西方世界对中国制裁，1996年台海导弹危机，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等等，中美在人权、台湾、西藏等问题上都发生过分歧和冲突。另一方面，中日两国在历史认识、台湾、钓鱼岛领土争端等方面，也不乏矛盾摩擦尖锐之时。但是，中日美三国通过对共同利益认知的沟通，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化解

¹Kurt M. Campbell and Jake Sullivan, “How America Can Both Challenge and Coexist With China,”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19.

了矛盾冲突。

从长期来看，中国与美日同盟的博弈呈现出三个变量：实力、规则、模式的竞争与合作。即，在大国权力转移、地区安全秩序的规则维护与塑造、国家发展模式等三个方面，中国与美日两国具有重大差异。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指出，与美国出现软实力相对下降的情况相比，中国具有独特的软实力优势；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则提出中国模式的独特性与适用性。

此外，中国与美日同盟的博弈呈现出三个不变因素：力量均衡（均势）、盟国外交、竞合关系。布林肯、谢淑丽（Susan Shirk）等指出，美国将继续推行均势外交政策，深化盟国外交合作政策，加强力量平衡，实行“巧竞争”战略，增加与中国竞争的优势力量。另一方面，中日美三国将长期呈现竞合关系，呈现中美竞争合作、中日竞争共存的态势。

2021 年中美关系经历了深刻危机，但是正如约瑟夫·奈所指出的，中美关系尚未跌入最坏状态。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也指出，中美之间已经形成十分成熟的大国关系，中美仍然在努力发展建设性关系。而中日关系具有脆弱性、不稳定性，尽管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的道路出现困难，但是中日两国经济关系依然十分紧密。因此，有必要讨论重构中日美战略关系的未来前景。

首先，探寻共同的战略利益。中日美在气候变化、核不扩散、全球疫情控制等方面存在广泛的合作空间。此外，中日美可以共同建设智能全球化，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战后以来，以国际协调主义为指导原则，中美日三国在战略大三角关系框架下，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世界经济的繁荣稳定。近年来出现“过度的全球化”倾向，特别是新冠疫情爆发后，全球供应链开始重组，各国经济政策出现调整，中日美三国有责任、有能力共同推动新型智能全球化的发展。

其次，推动中日美合作与“良性竞争”关系的发展。谢淑丽于 2019 年主持编撰了政策报告《修正航向：有效且可持续的对华政策调整》，倡导美国政府在保持与中国经贸、民间社会往来的基础上进行“巧竞争”，而非全面与中国对抗。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特征是全面竞争、战略竞争，本质是“竞争性合作”，中美应共同探讨合作与良性竞争的道路。

其三，关注日本在中日美关系中的特殊作用。如前所述，在建构中美日战略

大三角关系过程中，日本两次发挥了重要的“先行”作用。目前，作为中美夹缝中的“第三方力量”，日本应发挥协调作用，防止中美关系走向危险边缘。

根据日本 2021 年度的《外交蓝皮书》，日本提出要继续强化作为日本外交安全保障基轴的日美同盟，同时强调对华关系是日本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稳定的日中关系对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至关重要。岸田文雄出任日本首相以来，开展与中国的首脑外交，多次强调“中国是一个重要国家，必须继续对话”；表示日中关系正在迈入新时代。以日中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为契机，共同努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的、稳定的日中关系，继续加强经济合作和民间交流，就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等重要国际地区问题密切沟通合作。

综上所述，作为排名世界前三位经济体的美中日三国，直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在新时代建构理性、安全、稳定的大国关系，造福世界人民，是摆在三国面前的历史性课题。

日方学者点评

一、川岛真 教授

国际协调的重建为世界共同的目标，特别是世界经济三大国家的美中日之间的协调，是国际协调重建的最重要一部分。重建国际协调时，需要思考国际协调动摇的原因。

第一，美国面对不少国内问题，比如贫富差距的过大和民主主义的功能问题导致了国内政治的动摇。以特朗普为代表，美国国内有反对国际协调的声音，他们支持美国的单边政策，不重视 WTO、决定不参加 CPTPP、以及不支持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另一方面，美国也并没有完全放弃国际协调，比如美国重视 NPT 体制等架构。所以，为了重建国际协调机制，把美国拉到国际协调的正轨，中日应准备一些美国容易进来的国际协调的空间。

第二，目前美中之间军事安保上的“竞争”，以及民主和自由等“价值”问题都是容易引起争执的大问题，不言而喻还有台湾问题，以及一些区域问题皆为敏感问题。中美日三国为了重建国际协调，需要妥当处理这些“敏感”问题。三国需要建立定期的首脑交流、相关机构之间的热线、策划对意外事件的处理方案等。尽量做好危机管控，妥当管理“竞争”点。

第三，美国不接受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出现了美中之间的竞争。美国明显地放弃了基辛格以来的所谓“接触”（engagement）政策，美国 1970 年代以来一直期待和相信中国将来能融入既有的世界秩序，以及中国将来成为西方式的所谓民主主义国家。但是，美国发现这些“期待”可能不会实现。所以，美中两大国需要在这种条件之下，建立新的关系。两大国之间有“竞争”是自然的事情，同时双方亦有“不冲突”等重要共识。其实，2021 年在美中“脱钩”（decoupling）的状况之下，美中之间的贸易量增加。美国限制的不过是军民两用的高科技领域而已，美国经济界也基本上依靠中国市场。所以，美中关系也应该把经济作为突破口，建立新的信赖关系。

第四，军事安保上，日本基本上追随美国。但在经济问题以及非传统安保领域，未必与美国一致。特别在国际经济和金融的协调方面，比美国更为积极。此

外，RCEP、CPTPP 和日欧 EPA 等大型经济合作平台，皆为近年日本所着力推动的合作机制。如果日中之间进一步推动经济合作，在 RCEP 等领域深化合作，解决存在的问题，开辟新的合作领域，那么就有可能进一步与欧盟相协调，并推动经贸合作，最终使美国经济界也被吸引到新的经贸合作平台以及新的贸易“规则”的建立——这样的契机应该存在。当然，如果安保等问题上的美中“竞争”和欧中之间的“竞争”过于激烈的话，那么这种“合作”则难以进行。所以，首先妥当处理和管控那些“竞争”，然后才会有“合作”的可能性。

二、青山瑠妙 教授

中日关系不仅仅是中日关系，而是始终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运行。本章以“国际协调主义”为核心概念，回顾自 1970 年代以来中美日战略三角关系的历史，对 2021 年的现状进行了充满深意的分析。

本章指出，通过对历史背景的梳理和客观的分析，可以理解中国与日美同盟的战略竞争具有三个基本要素：均势、同盟外交、竞争关系。我认同这个观点。

谈及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时，既往的观点往往存在高估美国对日本影响力的“陷阱”。但是，正如总论一那样，本章指出了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作用的变化，包括日本外交的自主性和自律性。我认为，这使得中国对中美日战略三角的认识更进了一步。

三、专题研究

专题一

2021 年的日本社会与中日关系管窥

2021 年日本社会老课题持续演化，新动态层出不穷，而中日关系则出现冷暖交叉的新局势。

一、日本社会的老课题持续演化

首先是日本社会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少子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人口持续减少。据总务省统计，2021 年底日本总人口 1 亿 2544 万，比上年减少 63 万。据厚生劳动省统计，2019 年特殊出生率为 1.36，2020 年为 1.34。疫情影响下怀孕和结婚减少，可能加速日本少子化趋势的发展。预测 2021 年特殊出生率将低于上年。同时，日本是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据总务省统计，截至 2021 年 9 月 15 日 65 岁以上的老龄人口达 3640 万人，比上年增加 22 万人。老龄人口占总人口 29.1%，比上年上升 0.3%。少子老龄化被视为“国难”，导致劳动力短缺、消费低迷、通货紧缩、地方凋敝、社会缺乏活力等后果，而且政府财政不堪重负，对日本综合国力和国民心理带来负面影响。解决少子老龄化这个社会老难题并非易事，不仅需要在育儿援助、年轻人的结婚和生育、多子家庭的照顾、男女共同工作、学校教育、社会福祉等多方面推进具体有效的对策，更需要在增强综合国力和提升国民信心方面进行长期努力。

其次是日本社会阶层结构问题。尤其是贫富差距扩大。2021 年 12 月 9 日 NHK 特集“下沉的中流”（「沈む中流」）引起网络热议。其要点是与 90 年代相比中流家庭的所得减少，一家所得 400 万日元以上的减少了，200 万日元或 300 万日元的在增加，认为自己没过上“中流生活”的人约占总数的 30%。日本社会中产

阶层占主体的社会基本结构无疑没有根本变化，但是“上流”与“下流”的两极分化以及中产阶层向中下层流动的趋势较为明显，疫情影响下日本社会呈现基尼系数小幅上升和贫富差距日渐扩大的状况。儿童相对贫困率约 14%，单亲家庭相对贫困率达一半以上，老年贫困问题呈加重态势。日本社会中接受生活保护的家庭数有所上升。虽然日本政府对贫困儿童和家庭采取了一些援助措施，但是贫富差距扩大的状况并未得到明显改善。解决贫富差距的社会难题，也是日本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

第三是日本的区域结构问题。尤其是地方社会衰退，区域差距扩大。由于大城市教育和就业机会较多，物质文化生活丰富，吸引地方的年轻人不断向东京等大城市集中，导致大城市人口过密和地方人口过疏的分化，进而导致区域差距扩大。东京“一极集中”的老难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东京圈（包括东京、神奈川、埼玉、千葉一都三县）仅占全国 6% 的面积，却居住着近 30% 的人口。可见区域失衡严重。而疫情使东京“一极集中”的弊害再次凸显。东京圈人口过于集中，自然成为疫情重灾区，新冠感染人数约占全国的 30%。疫情使得东京等大城市的一些居民认识到人口过密的弊害，表示了迁居地方城市或郊区的意愿。有学者提倡重新审视东京“一极集中”的利弊，把日本建成一个分散型的可持续的福祉社会。再从地方社会的衰退来看，少子老龄化严重，劳动力不足，农林渔等传统产业衰退，导致税收减少，地方财政短缺，社会经济缺乏活力。一些地方城市空心化严重。年轻人口的减少还带来医疗、福利、护理等服务的减少，甚至使地方的传统庆典活动难以为继。一些偏僻村落的过疏化更为严重，老龄化率超 50%。切实实施发挥地方活力、促进地方振兴的对策也是日本社会的一项艰难任务。

日本社会不仅有上述社会结构性老问题，还面临着长期经济低迷，社会基础设施老化、劳动生产率相对下降等课题。在经济低迷的状况下，民众对未来感到不安。克服社会不安，推进“三安”社会的建设，是日本社会的重要使命。

二、日本社会的新动态层出不穷

12 月 13 日《每日新闻》等 8 家媒体评选出 2021 年日本十大新闻：（1）新冠疫情下医疗紧张，疫苗接种率超 7 成。（2）东京奥运会及残奥会以无观众方式举办。（3）首相菅义伟辞职，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获绝对稳定多数席位。（4）

真子公主与小室圭结婚。(5) 热海泥石流灾害。(6) 日本大学理事长涉嫌逃税被捕。(7) 电车内伤人事件接连不断。(8) 大谷翔平获全美职业棒球联盟 MVP 称号。(9) 真锅淑郎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0) 联署罢免爱知县知事签名涉嫌伪造。这十大新闻反映了 2021 年日本社会多方面的变化。排位前三的新闻尤其受到关注。

首先，新冠疫情对日本社会产生深刻重大的影响。2021 年日本经历了两波新冠疫情的冲击，2021 年底全国新冠感染者累计超过 173 万。由于疫情影响，经济活动受到限制，经济复苏迟缓，2021 年前三个季度平均负增长。疫情导致失业人口增加、就业困难、收入减少。疫情促进了远程办公、居家工作、线上课堂、网络购物等发展，既有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学习方式、社交方式发生变化。疫情也殃及政局稳定。菅义伟 2020 年就任首相后试图对防控疫情和恢复经济两者兼顾，未能如愿。由于应对疫情不力，经济业绩乏善可陈，引发国民不满，内阁支持率大幅下跌，仅有 25% 左右。由此引起自民党内“倒菅”风潮。菅义伟被迫宣布不谋求自民党总裁连任，9 月 29 日岸田文雄当选自民党总裁，10 月 4 日就任首相。岸田于当月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而 10 月底众议院选举之际，新冠疫情戏剧般迅速退潮，有助于自民党选举获胜。

其次，众院选举和政权更迭反映了日本政治社会生态的变化。岸田领导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获胜后，于 11 月 10 日再次当选首相。这次大选，给日本的政治生态带来重大变化。自民党虽减少了 15 个席位，但仍获得远超半数 233 席的 261 个席位，加上公明党的 32 席，“自公联盟”在众议院达到“绝对稳定多数”。多年在修宪等重大政治议题上对自民党形成制约的第二大政党立宪民主党的席位大幅减少至 96 席，致使枝野幸男不得不辞去党首职务。而以大阪地区为基础、保守色彩浓厚的维新会获得 41 个席位，猛增 4 倍，跃居众议院第三大党。大选结果显示，自民党虽然因为抗疫不力、政治丑闻等引发国民不满，但日本政坛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基本格局没变。随着维新会席位剧增，众议院保守势力有所增强。立宪民主党由于席位大减，对自民党的制约能力弱化。这次大选也反映了日本社会倾向的变化。大选中许多选民不是以传统的左右之分或保守革新之别来做出投票选择，而是更多地从国民生活和区域振兴等视角进行投票判断。实质上表明了日本民众渐渐远离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政治，反映了日本社会不关心政治的非意识

形态化的倾向。

再次，东京奥运会冒着疫情风险举行对日本社会得失并存。2021年7月23日，2020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后开幕。这是一届特殊时期的特殊奥运，现场无观众的奥运盛会前所未有，当然东京奥运会为疫情下的世界体育盛会的举办进行了探索，人们通过各种传媒手段依然可以分享各国运动员精湛的技能。尤其是在疫情肆虐的人类社会灾难时期，“世界一家”的奥林匹克精神更显异彩，由此可说东京奥运会的举办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冒着新冠疫情的巨大风险举办奥运也受到多方质疑。日本政府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最终得分不多，原先期待借此机会推动旅游业发展、促进消费、刺激投资、振兴经济的愿望没能成真。

2021年日本社会还出现了一些振奋人心的喜讯。在科技领域，普林斯顿大学真锅淑郎高级研究员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在体育领域，棒球选手大谷翔平荣获美国职业棒球俱乐部的最佳选手称号，象棋棋手藤井聪太开创最小年龄荣获棋圣、王位、叡王、龙王四冠的新记录，高尔夫球手松山英树荣获日本首位男子高尔夫大师赛冠军。而环保领域确定的GEG排放量2030年度比2013年度削减46%的目标，对日本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尽管2021年日本社会经历了热海泥石流等天灾，遭遇了电车内伤人事件等人祸，但日本民众最终还是选择了“金”字作为年度汉字，其含义既涉及疫情下政府发放的各类补贴金，还顾及东京奥运会上日本选手荣获多枚金牌，或许更表明了日本民众对金色未来寄予新的期望。

三、中日关系冷暖交叉的新局势

2021年中日关系出现新的局势,其特点是冷暖交叉，既有趋冷降温的动向，又有向暖升温的努力。中日关系在2018年回到正常轨道后，近两年再次趋冷降温，2021年中日关系的冷空气明显增多。2月1日《海警法》正式生效。引起日本朝野的不安。3月日美“2+2”会谈、随后的日美首脑会谈和七国集团峰会，都在联合声明中加入了涉台内容，引起中方的担忧。自民党总裁选举和众议院选举中，政治家都将中国问题作为助选话题。除公明党之外，其他政党在对华负面认识上基本一致。少数政要扬言要和美国“共同保卫台湾”，年末，前首相安倍晋三鼓吹“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日美同盟有事”，99名国会议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都是偏离中日间四个政治文件、损害中日关系的言行。不仅政界对华冷空气

增强，而且国民感情下滑势头还在继续。2021年中国外文局和日本言论NPO共同实施的“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显示，有90%以上的日本受访者对中国持有负面印象，而66.1%的中国受访者对日本持有负面印象，意味着中日两国的国民感情降至新低，反映了中日关系的严峻形势。中日关系趋冷是内外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就外部环境而言，显然是中美战略博弈所产生的影响，从内部因素来看，既有政界右翼势力嚣张的因素，也有媒体负面报道导致舆论变化的因素，而深层原因是中日国力逆转的新形势下，两国结构性矛盾的凸显和两国战略性竞争的加剧。

中日关系总体趋冷降温的背景下，也有向暖升温的努力。在政治领域，10月4日第一届岸田政府刚起步。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就在第一时间表示祝贺，岸田就任首相4天后就与习主席举行了电话会谈。习主席对日本新政府重视保持两国高层沟通表示赞赏，表示愿同日方加强对话合作，本着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精神，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岸田首相表示以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为契机，共同努力构建建设性稳定的日中关系。两国领导人及时互动，使岸田政府的对华外交有了一个好的开局。10月底众议院选举结束后，岸田不顾保守政客的阻扰，任命前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林芳正接任外相，被认为是有利于中日关系止跌回升的积极信号。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先后与茂木敏充和林芳正电话会谈，确认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双边关系。这些都有助于中日关系的向暖升温。在经贸领域，2021年1至11月，中日贸易总额达3338亿美元，同比增长18.9%。新冠疫情下日本对华贸易逆势增长，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占比创下了23.9%的最高记录。同期日本在华投资收益率在其海外投资收益率达到16.7%的历史最高水平。可见双方相互依存深化，利益纽带强韧。新年伊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生效将为中日开辟新的合作空间，通过RCEP平台首次建立中日自贸协定关系。在民间交流领域，受到疫情冲击，访日中国人从最高峰的959万降至5万以下。但是，中国积极支持东京奥运会，派遣了参赛史上规模最大的代表团共777人(其中运动员431人)参会。通过奥运参赛和体育交流，促进了中日民间友好交流。2022年2月将举办北京冬季奥运会。虽然美国对北京冬季奥运会进行外交抵制，但是日本依然决定派遣桥本圣子前参议员等政界人士出席。期待北京冬奥会进一步促进中日交流。

中日间存在不少分歧和争端，也存在加强对话和扩大合作的空间。中日关系在新的一年里仍将呈现低位徘徊、冷暖交叉的局面，基本格局还是“竞合共生”。期待以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为契机，推进中日关系逐步升温回暖，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

日方学者点评

一、川岛真 教授

日本的高龄化已经到了严重的地步，除了社会保障预算膨胀，引起了财政危机之外，还有不少政治方面的影响。第一，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的状况与美国等国家并不一样，不是富裕集团和贫困集团的隔开，而是多数的中流阶层总体贫困化。所以，日本政府也必须考虑这一多数基层的利益和立场。而在这一多数阶层里面，老人占多数，他们的对华意识并不好。第二，日本的舆论调查显示，对中国的感情最不好的就是 60 岁、70 岁以及 50 岁年龄层的人。90 岁左右的人经历过战争，对中国的感情较好，但是基本上占日本社会多数的高龄人群对中国的感情不好。相对来说，年轻一代对中国有好感的居多。而现在日本的“领导层”以 60-70 岁年龄层为主，而且人口也多。这些高龄人群有保守倾向，所以自民党政权有以 60-70 岁高龄人群的意见决定政策的倾向。第三，高年龄的世代对中日关系的看法，还受到以前记忆的影响。他们的心目中还留下来 1980-90 年代的中日关系，大部分的高年龄的人们难以接受作为高科技大国的中国。但是，年轻一代眼中的中国当然是 21 世纪的已经发达的经济大国。因此，今后中日两国应以年轻一代之间的交流为要，推动年轻人之间的交流。第四，日本传统媒体的读者，大部分也都是高年龄阶层。所以，其内容也越来越反映那个高年龄时代的观点。

中国的学者和媒体，经常提出日本的“右倾化”，以及警惕日本的“再军国主义化”。确实，安倍政权的最后一年，阁僚的靖国神社参拜问题几乎变为较松，菅义伟政权也继承了安倍政权最后一年的方针。但是，国会议员的作为和表态不一定代表整个社会的“右倾化”倾向。希望中方学者多关注和分析日本社会世代之间的差异，思考和制定多元性、有效的对日公共外交举措。

二、青山瑠妙 教授

专题一讨论了日本的老齡化社会问题和新冠疫情灾难导致的日本社会新状态，指出老齡化社会、贫富差距问题、中央集权问题是日本社会一直面临的课题。虽然在去年 11 月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中，保守派在日本议会中势头强劲，但他们

显示出了背离日本社会的政治与价值观的倾向。在这样的社会变化中，日中关系趋于恶化。但在习近平主席和王毅外长的努力下，中国发出了积极的信息，经济关系保持稳定态势。

本文的分析很重要，客观地反映了日本社会，或者是当前的日中关系。正如其所指出的，新冠疫情灾难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新冠疫情灾难中，日本出现了“逃离东京”的现象，这甚至出现在了正值工作鼎盛时期的 30 多岁的人群之中。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由于新冠疫情，东京 23 区首次出现人口倒流现象，这改变了人口集中涌入东京的状况。新冠疫情结束之后，远程办公和“逃离东京”的现象是否还会继续，值得关注。

的确，在去年的众议院选举中，日本 19 岁青少年的投票率低至 35%，比整体投票率低了约 21 个百分点。这可以说是一种年轻人远离政治的现象，其背后的原因之一是年轻人认为“即使投票也不会有任何改变”，这是对政治的强烈不满。

新冠疫情可能正在日本社会的深处引起巨大的地壳运动。这个地壳运动正在以及将会如何改变日本政治，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课题。

专题二

日本政治：从安倍路线到岸田路线

2021 年是日本政治的“大年”。新冠疫情的蔓延、东京奥运会的不确定性以及经济的持续低迷给执政的自民党带来了重大挑战。虽然 10 月末举行的众议院选举让自民党虚惊一场，但自民党内的权力格局、日本政治的整体走向，已经显露出变化的端倪。

一、岸田政权稳中有进、安倍路线遭遇危机

2021 年日本政治的重头戏是岸田政权的诞生。岸田文雄成为日本首相，既有偶然也有必然。前任菅义伟政权受到抗击疫情不力、经济持续低迷等因素的影响，最终在 9 月初表示不再寻求连任。接下来的总裁选举中，岸田文雄、河野太郎、高市早苗、野田圣子等出马竞选，其中岸田文雄和河野太郎在伯仲之间，最终凭借自民党最大派系细田派的支持，岸田文雄在第二轮选举中成功当选。

当选总裁后的岸田文雄并没有获得舆论的过多期待，各大媒体所作的舆论调查显示其内阁支持率仅维持在 50% 左右。舆论对岸田执政能力的质疑一直存在，10 月末举行的众议院大选是最大的考验。以“哀兵政策”应对的自民党在大选后的议席数虽有减少（减少了 15 席），但仍然以 261 席维持在国会中的“绝对稳定多数”席位。自民党议席减少的数量远低于当初的预期，舆论对岸田政权的信心指数开始增加，而岸田政权也在经济政策、疫情应对政策等领域同前任菅义伟政权甚至前安倍政权相切割。持续上升的内阁支持率，表明岸田政权的执政基础更加稳固。

自民党的总裁选举以及众议院大选让党内各大派系的权力结构面临重组。首先，石原伸晃因为在小选举区落选导致“石原派”（近未来研究会）名存实亡，石破茂所领导的“石破派”（水月会）也因为成员的减少而从“派阀”变成为“议员集团”（group）。二阶俊博所率领的“志帅会”遭到严重削弱，在众议院选举后其所

属的派系议员减少了 10 人。其次，安倍所在的“细田派”仍然稳居自民党最大派系，虽然安倍本人就任该派系的会长，但是他对岸田内阁的影响力开始弱化。安倍与岸田的合作与竞争（安倍路线 vs 岸田路线）将是接下来日本自民党政治的主旋律。第三，自民党内新的权力中心已经成形。自民党内各大派系、各主要政治人物继续活跃在政治舞台，但是茂木敏充、林芳正等人已经开始具备影响力，自民党内部正在进行缓慢的权力过渡。值得注意的是，自民党干事长甘利明在小选举区中的落选，虽然后来通过比例代表区复活，但是小选举区的失败迫使他辞掉干事长一职。而岸田派出身的林芳正从参议院议员转投众议院选举并成功当选。

在赢得众议院选举之后，岸田文雄加速了“脱安倍”的进程。在 9 月份举行的总裁选举中，岸田并非安倍的第一支持人选，安倍有意推举他一手培养起来的高市早苗。岸田在当选自民党总裁以及首相之后，安倍有意向岸田输送其亲信担任党政要职，岸田并没有全盘接受他的建议，这招致安倍的不满。虽然“安倍派”出身的松野博一最终出任内阁官房长官，但他在岸田内阁中的影响力以及在党政高层中的协调力与菅义伟担任内阁官房长官时期不可同日而语。另外，岸田任命本派阀出身的林芳正为外务大臣，也成为二人矛盾的焦点。安倍与林同属于山口市选区，因为选举区存在合并的可能，他们二人或许会在未来为争夺议员席位展开竞争。与此同时，林芳正曾任“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会长，而安倍及其家族却有着“亲台”的政治基因，这也为接下来日本对华政策上所呈现出的“对立”埋下伏笔。

二、在野党愈发式微、分化重组势在必行

2021 年的众议院选举进一步弱化了在野党的影响力。首先，国会第二大党立宪民主党势力遭到严重削弱。立宪民主党选择了与日本共产党等在野党合作的“野党共斗”策略，但是效果并没有呈现，立宪民主党在大选中减少了 13 个席位，日本共产党也从选举前的 12 席减至 10 席。立宪民主党作为制衡自民党的重要力量，在政策主张上缺少现实可行性，竞选纲领并无亮点，除了作为在野党反对自民党的政策之外，并无太多能够争取中间选民的空间。最终，党代表枝野幸男辞职，立宪民主党与日本共产党的联合事实上以失败告终。

众议院选举中议席增加最多的是日本维新会。议席数从选举前的 11 席增加

至 41 席，一跃成为众议院第三大党。日本维新会势力的增加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得益于其接收了部分从自民党退党的国会议员，从而带来了相当程度的支持选民；另一方面在于自民党的支持者转向了日本维新会，日本维新会与自民党在政策理念上相似点较多，自民党执政期间因为抗疫不力、经济乏力，让这些支持者被迫将选票投给政治理念相对接近的日本维新会。

同样增加议席的还有国民民主党。国民民主党与立宪民主党本属于相同的政党谱系，但是在 2021 年的众议院选举以及之后的政治活动中，国民民主党与日本维新会的选举合作、院内合作越来越多。国民民主党与日本维新会所标榜的“中道-第三极”在涉及新冠疫情补贴、国会议员文书通信费、修改宪法等具体领域也有协调。2022 年夏天即将举行参议院选举，未来两党或可保持合作的势头，这不仅会对自民党在参议院中的议席造成一定的冲击，同时也会进一步限制立宪民主党的活动空间。

在野党的分化重组不仅仅会冲击政党政治的格局，同时也会影响到一些重大议题的走向。例如关于修改宪法的讨论，支持修宪的政治势力（政党以及政治家）已经成为主流。除执政的自民党力推修宪之外，日本维新会以及国民民主党等部分在野党也属于修宪势力。对岸田内阁而言，当共识凝聚到一定程度，特别是有了来自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的支持，修宪的进程或可大大加速。

三、日本国内政治关涉对华政策，但不应有过度期待

2022 年将是岸田进一步稳固政权，寻求长期执政的关键一年。今夏即将举行的参议院选举是重要的风向标，而对这一风向标产生影响的则是新冠疫情、日本经济以及所面临的国际形势的走向。对于中日关系而言，2022 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但是近期的中日关系整体并不理想，岸田政权主推的几项政策主张从目前来看恐怕只会从负面影响中日关系。

首先，岸田政权计划在 2022 年内重新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日本第一个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始于安倍执政的 2013 年。彼时，为配合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成立，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制度上、能力上对日本的军事安全做出系列安排，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攻击性。如今十年已近，岸田版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或将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经济安全保障战

略等问题纳入讨论的议程中，而这些政策主张大多是将中国作为潜在的牵制对象来对待的。

其次，修宪议题或将在 2022 年得到实质性讨论。岸田上台后将自民党的“宪法修正推进本部”更名为“宪法修正实现本部”，意在表明在其任期内实现修宪的目标。在推进修宪的姿态上完全不逊于安倍晋三、麻生太郎等保守派政治家，可以认为，修宪在自民党内部已经不是判断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标准。目前，岸田内阁掌握着修宪动议的主动权，从政策议程来看，2022 年下半年（待疫情缓和）岸田如能进一步稳定执政根基，其动议修宪的可能性比较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修宪或配合当前国内热议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以及“部署中导”等讨论，如果修宪成功且对宪法九条的条文做变通性的解释，那么“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以及“部署中导”等讨论也将很快成为现实。

第三，日本国内或将继续炒作人权以及台湾等议题，进一步恶化中日关系的舆论环境。岸田上台后新设国际人权问题担当首相辅佐官，积极利用双边和多边外交机制推广日本的人权外交理念。与此同时，日本还强化对中国人权政策的攻击。在涉及台湾的问题上，自民党保守派的呼声甚高，安倍本人利用其“前首相”的身份以及自民党最大派阀领袖的影响力为台湾站台，在其出席台湾一家智库论坛时，他甚至放言“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当然也有不少舆论认为，日本在对华政策上反映了自民党内部的派系竞争。但是也不应该过度放大这种差异，毋宁说在自民党内部甚至日本国内，警惕以及牵制中国的主张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共识，所以没有必要放大国内政治派别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对于中国而言，应该保持对日本国内政治变动的关注，尤其是关注修改宪法、经济安全保障、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具体政策议题的走向，以“战略定力”和“底线思维”来应对日本对华政策可能的变化。

日方学者点评

一、川岛真 教授

此文对岸田政府的评估和日本政治的分析相当正确，赞同对岸田政权不可有过度期待。为了补充本文的观点，提出以下三点。

第一，虽然岸田和安倍之间有政治路线上的矛盾，但是分析他们的关系时，要注意到安培的两副“面孔”。他的第一个“面孔”为“安倍（细田）议员集团（清和会）的领袖”。此集团目前是自民党最大的议员集团，包括各种各样的议员，比如下村博文和岸信夫等保守议员，以及福田达夫等稳健议员。安培的另外一个“面孔”是自民党保守议员之代表。自民党的国防部会和外交部会有不少保守议员，他们的声音不小，经常给首相官邸很大的压力，而安倍是保守议员的代表性政治家。

重要的是，安倍集团给岸田内阁提供人力资源基础，除了官房长官之外，不少重要内阁席位被安倍集团占有。因此。虽然岸田和安倍之间有政治路线上的矛盾，但是作为安倍集团的领袖，安倍无法过度批判由自己集团派出的占据重要位置的岸田内阁。特别是安保问题和台湾问题，安倍作为保守议员的代表开展了一些活动。但是因为安倍不得不支持岸田政权，所以安倍作为“保守议员领袖”的活动也有限度。

第二，日本的媒体报道岸田和安倍之间的暗斗，比如岸田接近麻生太郎，由岸田集团、茂木集团和麻生集团一致对抗安倍集团等等，不知道有多少实际成分。但是作为首相和自民党的总裁，岸田必然需要有主导性，所以与最大派系安倍集团的博弈，实属比较自然的行为。如组阁之时，岸田同意岸信夫和萩生田光一等安倍集团的保守议员入阁的同时，也提拔安倍集团中的“稳健”议员福田达夫为自民党总务会长。岸田不一定对安倍集团唯唯诺诺地追随，但也不一定要形成“对抗”“敌对”的状态，而是保持平衡，追求主导性。

第三，岸田政府今年要使经济安保法案在国会成立，以及到年底策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这些法律和文件会影响到中日关系，值得注意。比如现在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旧版）”也有与中国相关的部分，但其基本上是以日中战略互

惠关系为基础的。那么，2022 年的新版有可能再写日中战略互惠关系吗？虽然时值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但也可能无法讨论战略互惠关系的继续，或者新的架构。岸田政府如何处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与中国相关的部分，是一重要问题。

此外，疫情之下，人的往来被限制，各国的网络空间也情绪化，褊狭的民族主义容易出现。中日两国在从疫情走出来的过程中，如何管控情绪化的网路舆论空间，也是重要的课题。

二、青山瑠妙 教授

本章关注的焦点是日本政治，考察了从安倍到岸田的政治路线，分析了日本派系政治的现状，预测了自民党下一代的政治家领导人，并考察了在野党的重组过程，并关注当今日本的派阀问题，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

本章精准把握日本的政治动态，指出自民党内部的派系竞争对日中关系的影响是有限的。若说我本人有什么期待的话，则希望能够深入分析、探讨一下从安倍政府到菅政府、以至岸田政府的政权更迭过程中，自民党派系政治的变迁和在野党的动向。

专题三

日本战略定位的偏移与中日关系漂流下跌的风险

2021年，中日关系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漂流和倒退。2022年7月日本将举行参议院选举，秋天中国共产党将召开20大，11月美国将中期选举。在中日美三国上述重要政治日程密集的年份，9月将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中日关系能否在中美日三边架构中找到合适位置走向改善转圜，还是会出现断崖式下滑备受关注。

一、2021年：从中日新时代到日美新时代的转变

进入21世纪后中日经济依存不断深化，然而两国政治关系的相互不信任反而日益增加。2017年开始，中日关系走上了迅速改善的快车道，双方首脑互访等高层交流机制恢复，2019年中日领导人宣布建立新时代的中日关系，新时代中日关系也成为了日本对华外交的关键词。直到2020年初，新冠疫情初期中日两国通过相互捐赠救灾物资展现了两国民意改善。然而，随着疫情扩散，美国特朗普政府采取全面敌视中国政策，在所谓“中美新冷战”氛围的冲击下，中日关系出现大幅度漂流。2021年1月，拜登入主白宫后强化同盟关系，3月召开美印日澳四国网上峰会。时任日本首相菅义伟作为拜登执政后首位外国首脑于4月到访白宫，双方发表的联合公报中提出建设“新时代日美全球伙伴关系”，新时代中日关系的关键词却随之淡出。2021年可以说是“日美新时代”逐渐取代“中日新时代”的一年，具体有以下关键时间节点。

首先，2020年12月发表的《阿米蒂奇-奈报告》为新时代日美关系提供了基本框架。这份报告发表在拜登民主党政府即将入主白宫之前，实际上向日本提供了美国新政府风向标。该报告涵盖了台湾问题上的日美合作，期待地区经济合作中日本领导力，经济安全保障，价值观等各个方面，鼓励日本成为更加对等的同盟国，极大提升了日本在美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该报告在日本被解读为是一个

不再做世界警察的美国期待日本发挥领导力、并在同盟关系中承担更多责任和发挥更积极主动作用的信号。

第二，2021年初开始，拜登执政后以新疆人权问题为由加大对华制裁，日本也出现了如果不对此进行讨论将会在7国集团内被置于遭批评境地的看法，自民党内部也成立了相应的人权小组。3月，美国印太军司令对媒体说台海可能会在6年内发生战事，人为渲染武力冲突气氛。日本的保守鹰派势力闻风而动，配合美国渲染台海紧张局势，对日本的舆论和对华政策产生了深刻的负面影响。

第三，2021年4月，日美首脑会谈正式提出日美新时代定位，提及台湾问题似乎是新时代的“关键点”。据新闻报道，美国方面希望在联合声明中更加直接提及台湾问题，而日本为了避免冲击中日关系试图在措辞等方面进行淡化等等。但无论细节如何，结果是日美首脑文件中时隔52年再次涉及台湾，并在新疆、香港、产业链、经济安全等一系列问题上指向中国。在中国看来，日美新时代似乎是对抗中国的代名词。

第四，4月底，2021年版日本外交蓝皮书删去了2020年版中把新时代中日关系推向新阶段的表述，首次写入了中国是日本安全保障上的严重忧患因素。对于中日关系定位也从之前的建立成熟的中日关系改为稳定的中日关系。8月13日，日本防卫大臣参拜靖国神社，这是2016年以来防卫大臣首次参拜。尽管首相没有参拜，但是有几位现任阁僚参拜，这与2017-2019年没有大臣参拜情况大相径庭。

第五，夏天的东京奥运会和岸田新内阁诞生让中国对中日关系可能转圜有不少期待。岸田首相当选后，中日领导人通话中也都提及了新时代中日关系。但年末日本一些政治人物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和日美同盟有事”，对中日关系产生了很大震动。1月21日，日美首脑视频会谈强化同盟，台海、人权、经济安全保障、海洋问题等，几乎都是针对中国的“熟悉话题”。2月1日，日本国会通过了关于人权问题决议，2月1日正值中国农历春节，2月4日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日本国会在中国举国欢庆的日子做出严重干涉中国内政的决议，其负面效应无疑雪上加霜。

由此可见，日本的外交战略在2021年已做出重大调整，从“日美同盟+中日协商”的平衡外交转向了“美国中心主义”外交，日美新时代取代中日新时代。

二、以牺牲中日关系大局为代价的日美新时代

拜登上台伊始，就推出了“同盟战略”，强调“美国的同盟关系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通过外交发挥领导作用，意味着我将再次与盟友和主要伙伴并肩站在一起”。在对华政策上，拜登一改特朗普的单边对抗转向多边制衡。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最重要盟友，拜登上台后不到半月内日美进行了5轮高官对话，向外界展示紧密而强韧的双边关系。而与此同时，日本的对华政策也开始与美国战略捆绑，并做出了一系列调整，“开启新时代中日关系”的进程被打断。2021年日本政府的对华外交在中国看来，是以牺牲“中日关系大局”为代价的重大转折。

第一，在战略上从主张协调合作转向强调竞争甚至对抗。首先是聚焦并炒作中国出台的《海警法》，渲染钓鱼岛海域的紧张局势和“中国威胁”，以此加强对钓鱼岛海域的力量部署，争取美国更深层次的介入。近年来，日美加强了在西太平洋进行联合训练和军事演习的频度，强化在西南岛屿的军事部署和威慑力。同时日本还将澳大利亚、印度、英国、法国等牵扯进东海的争端，试图拓展多边军事演习，以此向中国施压。其次在台湾问题上，一改过去谨慎立场，渲染“台海生变”和大陆“武统台湾”，强调所谓“日台命运共同体”，积极为“台独”势力站台。2021年2月，自民党外交部会成立了“台湾事务小组”，专门就日台关系的发展进行讨论。6月公布第一份政策报告，向政府提出了具体的加强日台合作方案。8月，自民党与民进党举行了所谓“外交安全对话”，启动所谓“2+2机制”，试图以此为契机，就日台之间关于外交、安保、地区安全和未来日台关系发展进行讨论并形成共识。此举严重违背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承若和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对中日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负面效应。

第二，加强多边外交博弈，强化对华牵制。2021年3月，日美印澳“四国机制”首脑会议首次在线上举行。日本是“四国机制”的始作俑者，拜登上台后积极推动“四国机制”走向前台。“四国机制”针对性明显，其目的是以此为抓手，共同推进“印太战略”，对冲和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

第三，经济关系的泛安全化和高科技领域的“选择性脱钩”。中日经贸关系具有深厚的积淀，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但在新冠疫情扩散和中美贸易战长期化的双重冲击下，日本开始重新评估和应对所谓“对华过度经济依赖”、“供应链脆弱性”等问题。根据2021年4月16日白宫发布的《日美有竞争力和弹性的伙伴

关系》，日美将通过投资 5G 等安全网络和先进 ICT 的研究、开发、测试和部署，加强数字领域的竞争力。为应对在尖端技术领域的竞争，日本建立了统筹处理经济与安全的专门机构及相关法律依托。中日在经贸领域和高科技领域也面临着“部分脱钩”的风险。

第四，公开介入中国内政问题，在没有切实调查和取证的前提下，在国会通过所谓“人权决议”，其目的就是配合美国对华“联合施压”。拜登上台后推行“人权外交”，强化所谓“共享价值”的意识形态纽带，将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作为打压中国的工具，制造不利于中国的舆论环境。

上述对华政策的一系列调整，说明日本已经做出战略选择。中国甚至怀疑日本已经由“随美制华”、“联美制华”，正在走向“导美抗华”。

在中美日三边关系中，日本国内存在着三种战略定位，即“桥头堡”，“沟通桥”以及急速上升的“急先锋”。

安倍首相执政后期，特别是 2017 年-2020 年年初，日本对于在中美日关系中的定位还是要做“沟通桥”和“平衡手”。但随着中美关系持续恶化，日本在中美日关系中的定位也出现了漂流和偏移。到 2021 年夏天前主要有两种战略思路。一种认为中美已经进入新冷战，而且新冷战会一直持续下去，甚至不排除热战，日本处于新冷战的最前线，必须自我定位为“新冷战桥头堡”。既然是中美长期新冷战，那么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友必须要分清敌友，立场坚定，因此需要在台湾、东海南海、人权、经济方面全面配合美国对华大战略。另一种则认为中美对抗有滑向长期对抗的新冷战危险，日本作为美国东亚最重要盟国不可能不卷入，但这不符合日本国家利益。日本需要发挥自身优势保持和中美沟通的渠道，做防止新冷战的“沟通桥”。因为稳定的中日关系不仅有利于中日双边关系，而且对于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至关重要。

但从 2021 年夏天开始，“新冷战急先锋”异军突起，似乎正在急速上升。这股新势力的主要逻辑是拜登政府从阿富汗仓皇撤退，财政支出法案不仅共和党，连民主党内也有反对声音，加上汽油价格增加和高通胀压力，拜登支持率大降。他们认为 11 月中间选举拜登民主党不仅会失去下院会，甚至可能出现上院也失利的双败情况。面对这样一个弱势总统和弱势美国，维护亚洲的自由国际秩序的历史使命自然落在日本身上。日本社会稳定，仍然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一个弱

势美国可以让日本在同盟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和主动性，可以主动设定同盟日程实现战略自主，而且可以在一些方面引领美国，增强日本的国际存在感。这股力量主张防卫费开支应该达到北约水平，从现在的 GDP1%增加到 2%，在国家安全政策中导入“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先发制人，增强威慑力。在他们看来，一个已经“疲倦的巨人”美国已经无力单独担负起维护国际秩序的重任，而这正是日本的战略机遇期。

三、中日关系大幅度漂流下跌的风险与管控

从岸田文雄首相的政治倾向来看，中道政治应该是其目标。作为宏池会的隔代传人，岸田在对外关系方面理应重视协调合作，走发挥国际关系沟通桥梁定位的道路。那么如何解释岸田内阁的对华政策对抗性不断强化呢？这与日本内部政治力量和派阀势力的博弈斗争紧密相关。而第三种所谓要抓住战略机遇主动做“急先锋”的力量正在迅速崛起，对前两种势均力敌的“桥头堡”和“沟通桥”的结构造成很大冲击，使“沟通桥”的声音受到进一步挤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战略定位可能由“随美制华”、“联美制华”演变为“导美抗华”。如此，则中日关系就存在着断崖式下滑的危险。主要诱因有三：一是上述政治精英层内部博弈；二是美国对华关系的负面影响；三是日本对华舆论全面负面。

尽管中日关系前景堪忧，但仍需要冷静观察，主动引导中日关系朝着稳定方向发展，同时也要看到中日关系断崖式下滑也存在着三个牵制因素。

首先，日本最终战略定位不仅受制于上述政治精英们的博弈，也受制于日本国民的认知。舆论调查显示，尽管日本民众对华负面认知高达 9 成；但与此同时，70% 认为中日关系重要，接近 6 成认为日本不应该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中国是日本永远“搬不走的邻居”，中日关系的历史经验证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联美制华”的结果必然是大幅度提高防卫开支，突破战后以来坚持的专守防卫政策甚至启动修宪，这一系列根本性政策调整最后都要过民意这道最大门槛。中道政治回归仍然是日本的主流民意，自民党内部三股力量的博弈是不可能在完全无视民意情况下演进的。

第二，美国的不确定性让日本始终存在着“第二次尼克松冲击”的担忧。2021 年尽管中美关系困难重重，但中美元首进行了两次电话会谈，一次视频会晤，特

别是 11 月的视频会晤时间长达三个多小时，而且是中国上午时间，美国深夜进行。相比之下岸田首相与拜登总统的视频会晤是日本深夜时间，而且时间仅为 80 分钟。日本充当美国遏制中国“急先锋”的结果是什么？日本是否能够承受和消化？不谪是个大大的问号。

第三，日本经济界很清楚与中国持续对抗将会损伤经济利益。近期对中日韩经济人士的调查显示，日本商界人士对于 RCEP 生效后受益回答最高。这说明日本经济界对于进一步融入亚洲一体化进程有很高的认同感。

就总体趋势而言，日本要做“新冷战急先锋”或者“桥头堡”的战略思维正在上升，并对“沟通桥”的战略定位产生了极大冲击。这种战略定位的偏移已经让中日关系处于一种漂流下跌的风险中，中日关系进入了避免发生决定性对立和冲突的管控时代。

如何管控中日关系的对立风险和断崖式下滑，需要有效开展战略沟通。而维持乃至扩大两国共同利益关切，则成为稳定中日关系的关键。岸田政府最近提出了“新现实主义外交”，强调“守护国民的安全和信心、保卫国家利益的外交和提升安全保障”。而“以邻为壑”与中国对抗可能是日本战略上最大的歧路。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远交近攻”外交给东亚各国带来了无尽的灾难。现今的日本如果“破釜沉舟”要做“新冷战的桥头堡和急先锋”，那么，无疑是再次走上战略歧途。在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的重要年份，中日关系何去何从？日本站在了自我战略定位的十字路口。

日方学者点评

一、川岛真 教授

本文警惕在中美“新冷战”时期，中日关系几乎作为代价被牺牲。确实，2021年的中日关系有一系列问题，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成果。但是，2021年的中日关系，也可以指出一些正面的事情。

第一，2021年日本政府对中国的“不作为”，不一定是依据什么“政策上的原则”所做的。特别是，日本政府和社会对拜登政府的看法影响到日本对中国的“不作为”。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大致上严厉，但也可谓“是是非非”：避免冲突，在军事安保、军民两用的高科技领域、自由民主等价值观、以及台湾问题等方面，对中国采用严厉的政策。但是，在气候变动以及区域问题（朝鲜、阿富汗、以及伊朗问题等）上，美国与中国合作。美国在上述对中严厉政策上与同盟国一起推动，但在后面的合作方面，美国单独实施对中合作政策。其结果，日本因美国的政策受到影响，即基本上认为虽然美国对中国严厉，但也不一定忽视美中合作的领域。目前，岸田政府也认识到这一问题，希望与中国的合作，但目前还没有具体方案。

第二，为了解日本对中政策，需要掌握影响日本对中政策的重要因素，特别是舆论。日本的每个政权都考虑舆论，而日本的对华舆论有明显的特色，即差不多九成的国民对中国有负面的感情，但同时有六成认为中日关系对日本重要。所以，每个日本的政权不得不先表示对中国比较严厉的态度，再确认美国和其他盟国之间的关系，如访问东南亚、印度等战略上重要的国家和地区，然后再回应“中日关系重要”的声音，处理与中国相关的事情。所以，每个政权需要一些时间才有可能确定对华政策，而任期较短的日本内阁，比如菅义伟政权还没有到确定对华政策的阶段就解体了。

第三，有关台湾问题，日本国内受到美国的影响，先普及“台湾有事”快要发生之说法，但是最近“台湾有事”的言论渐渐地平息下来。虽然在1972年体制之下，日本理解和尊重中国对台湾的立场，但是台湾的状况对日本的安保有特大的影响，日本社会不得不对此有关心。日本和台湾之间的关系是以经贸文化为主，

但是一直以来都有“国会议员”即“立法机关”之间的互动。所以自民党-民进党之间的交流和安倍原首相的发言等，日本社会一般认为并没有脱离 1972 年体制的轨道。但是，2021 年中国政府在历史决议等文件中明确批判台湾的民进党政权，从而影响到对日本政治家和民进党之间的交流评价问题。日本和台湾之间有很密切的交流，可能以后也继续有政治家之间的交流。所以，为了避免问题的复杂化，中日双方尽早就这一问题，确认或找出“正轨”。

二、青山瑠妙 教授

总论一和总论二虽然已经对中日关系和中日美关系进行了统揽，但本章则是基于更加具体的事实对日本的外动向进行了讨论。本章的特征在于尖锐地批评了日本的外交是“新冷战的最前沿”，这令我印象深刻。本章在最后部分列出了防止日中关系急剧恶化的三个因素。首先，由于日本社会认识到中日关系的重要性，舆论对政治起到了制约作用。其次，美国对中国的关注可能会给日本带来“第二次尼克松冲击”，这成为重新思考日本外交政策的一个因素。第三，日本商界重视经济利益，这或可成为稳定日中关系的一个因素。

当然，正如本章所指出的，上述三个因素对于防止中日关系下滑至低谷也许是有效的。若果然如此，那么日本的社会舆论对“第二次尼克松冲击”的担忧，以及日本商界的对华认识对当前的中日关系有何影响？如果能够在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上进行深入分析的话，本章中对中日关系的未来展望可能会更有说服力。

专题四

2021 年日本军事安全动向分析

2021 年是日本军事安全政策调整加速推动的一年。9 月，菅义伟政权和岸田文雄新政府在军事安全政策方面，总体上延续安倍政府时期的政策，继续谋求防卫政策突破，着力提升自主防卫能力，在强化日美同盟关系的同时，继续拓展多边安全合作。

一、强调地区安全形势复杂严峻，持续加大渲染所谓“中国威胁”

日本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引发国际力量格局深刻变化，大国战略竞争日益激烈；印太地区安全形势总体趋于严峻，日本周边国家“反进入 / 区域拒止”能力增强，日本必须加强“紧迫感”予以应对。4 月，日本防卫研究所发布《东亚战略概观》，认为国际秩序遭受二战以来最严重冲击，可能走向“两极格局”或“多极格局”；日本应争取实现对自身更为有利的“多极格局”，并力求成为中小国家的领导者。¹7 月，防卫省发布《防卫白皮书》，认为印太地区围绕领土争端、国家统一、民族宗教等问题矛盾争端依然存在；朝鲜半岛仍处于军事对峙状态，北方四岛和竹岛（独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非和非战的“灰色事态”呈现长期化和扩大化趋势；日本周边国家军力强化、军事活动活跃趋势日益明显。²日方在多种国际场合无端指责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已成为包括日本在内地区和国际社会在安全上的强烈担忧事项”，扬言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技术方面对国际社会产生了“不良影响”，并称“反对一切试图以实力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为”。同时，日本《防卫白皮书》《外交蓝皮书》《海上保安报告》《中国安全战略报告》等报告文件中称，中国正推动“建国以来最大规模军改”，力求深化“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引发关注；中国施行《海警法》是“破坏性事态”，应予以“高度关注”“强

¹ 防衛研究所「東アジア戦略概観 2021」、www.nids.mod.go.jp/publication/east-asian/j2021.html。

² 日本防衛省『令和 3 年日本の防衛』、東京：ぎょうせい、2021 年、132-135 頁。

烈担忧”，并炒作“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周边毗邻海域的出现和停留天数均创下新高”，日本必须“继续冷静且坚决应对”等，显示对华强硬姿态。

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屡屡“踩线越界”，高调选边站队。日本在《防卫白皮书》、日美首脑会谈及其他多种国际场合，多次强调“台海局势稳定对日本安全和国际社会稳定十分重要”。前防卫大臣岸信夫8月表示，台湾安全“直接关乎日本安全”。前首相安倍12月高调宣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并警告称“北京采取军事冒险行动，等同于走向经济自杀道路”。作为日本前首相如此清晰、高调表态，明显是在台湾问题上选边站队。安倍此言既是对大陆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威慑施压，同时也意味着一旦台海发生军事冲突，日本将进行武力干预，而且是日美联手军事干预。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将可能使日本陷于战争的危险境地。这是与习主席与岸田首相达成的“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重要共识完全相违背的。

二、加速推动安全政策调整，谋求突破“专守防卫”原则

岸田首相在2021年12月6日的施政演说中表示，将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量发展计划》等纲领性文件，并将于2022年底在日本内阁会议通过。这意味着日本新“安保三箭”即将出台，日本安全政策将出现新调整。一是突出强调“经济安全”。在菅义伟执政时期他就强调日本要“从经济安全保障角度出发”¹应对国际新形势。

岸田上台后，进一步强调“经济安全”的重要性。11月，新设以岸田首相为议长的“经济安全保障会议”，要求加快制定《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成立“经济安全保障室”、设立“经济安全保障基金”、制定“经济安全保障战略”，计划将成果纳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二是完善新兴领域安全战略。岸田指出，要重视太空和网络安全等新领域，“加快速度从根本上提升防卫能力”。9月，发布新版《网络安全战略》，明确提出将网络领域在外交和安全问题上的“优先度”提升至空前高度，不断强化网络防御能力、灵活运用可干扰对手使用网络空间的能力。²三是探讨发展先发制人打击能力。10月，岸田针对朝鲜“试射导弹”紧急召开国

¹ 「第二十三回国会における菅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http://www.kantei.go.jp/jp/99_suga/statement/2020/1026shoshinhyomei.html。

² サイバーセキュリティ戦略本部「次期サイバーセキュリティ戦略案について」、

家安全保障会议，指出“要探讨发展包括在敌领域内拦截弹道导弹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在内的所有应对方案”。11月，岸田对陆上自卫队发表训词时再次表示“探讨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如果把“拥有对敌基地打击能力”写入即将制订的新《防卫计划大纲》，将意味着日本“专守防卫”政策将被彻底改变；四是大幅增加国防开支，为发展军事力量提供财力支撑。日本自民党在众议院竞选纲领中提出要大幅强化防卫能力，将防卫费占GDP的比例提升至2%以上，企图突破GDP占比1%的限制。日本防卫省2021年度的防卫预算为51235亿日元，比上年度增加1.1%；2022年度的防卫预算为54797亿日元（突破500亿美元），增长率高达7%，系年度增长率最高的年份，也是日本年度防卫预算连续增长的第十年。¹

三、发展中远程打击能力，打造攻防兼备的作战力量

在空中作战方面，日本计划自美国采购105架F-35A、42架F-35B。2021年采购4架F-35A、2架F-35B战机，成立首支F-35B战机编队，在三泽基地成立第二支F-35A飞行队。同时与美英合作研发F-2后继机，计划于2028年进行飞行测试。在水面作战方面，继续对两艘“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进行航母化改造，计划再建1艘“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提升远程攻击作战能力；建造第7、8艘3900吨级多用途驱逐舰，提升自卫队执行多样化任务能力；2021年3月，海上自卫队最新型宙斯盾舰“羽黑号”入列，标志着日本8艘“宙斯盾”舰体系打造完成。在水下作战方面，“大鲸”级潜艇首舰“大鲸”号将于2022年3月入列，2号舰“白鲸”舰将于2023年入列，届时日本完成22艘潜艇体制。这种新型潜艇采用锂电池提供动力，活动半径和潜航时间进一步提高，在水下快速赶赴战区、抢占站位等方面将具备更大优势。同时还研发水下无人潜航器（UUV）等先进武器装备。在防区外打击方面，日本自主研发防区外巡航导弹，在12式陆基反舰导弹（射程200千米）的基础上自主研发增程型防区外巡航导弹，并将射程提升至1000千米以上，陆射型、潜射型、空射型将分别于2025年、2026年、2028年完成部署，空射型可搭载于F-2和下一代战机。同时继续采购可搭载于F-35A战斗机的挪威制联合打击导弹（JSM，射程300千米以上）。因预算紧张，防卫省暂停为

<https://www.nisc.go.jp/conference/cs/dai31/pdf/31shiryu01.pdf>.

¹ 防卫省「わが国の防衛と予算：令和4年度概算要求の概要」、2021年8月31日、<http://www.mod.jp/j/yosan/index.html>。

F-15J 配备美制远程反舰导弹（LRASM，射程 900 千米）和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JASSM，射程 900 千米以上）。此外，日本发展高超声速武器，自主研发高超声速滑翔弹，并着手研究高超声速巡航导弹技术。未来，日本还可能引进美国的反高超武器，研发轨道炮等先进武器弹药，进一步提升自卫队中远程攻防能力。

四、加强天网电新型力量建设，提升“多域联合”作战能力

为争夺新兴领域优势，日本正在加紧在天网电等领域的军事布局，完善新型力量的指挥体制和编制，研发可改变战场“游戏规则”的颠覆性技术。太空领域方面，在联合参谋部新设太空企划班，负责指导和协调太空联合作战，并筹划设立太空作战任务部队；建立隶属于航空自卫队的“太空作战群”，规模 120 人。继在东京府中设立“第 1 太空作战队”后，2022 年航空自卫队将在山口防府北新编“第 2 太空作战队”，编制各约 20 人。前者主要任务是太空态势感知，负责监测太空碎片，后者未来主要担负太空光电对抗任务。网络领域方面，日本自卫队大幅扩建网络作战力量。2021 年撤编联合参谋部下属的指挥通信系统队，并在网络防卫队基础上新编防卫大臣直属的“自卫队网络防卫队”，编制约 540 人，未来将增至 1000 人。在电磁领域，日本陆上自卫队于 2021 年 3 月在熊本健军基地组建第二支电子战部队“第 301 电子战中队”，编制约 80 人，主要任务是确保前沿部队通信畅通，用电磁波干扰对方通信和雷达。并计划在东京朝霞基地组建继北海道、熊本之后的第三支电子战部队，电子战总规模将达到约 450 人。

五、强化日美同盟威慑力，推动双多边安全合作

拜登上台后，重视同盟关系，日美两国在政策协调、军事合作、军事演习等各方面都强化了同盟关系。2021 年 3 月举行了日美“2+2”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双方确认，“面对严峻的安全环境，要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和应对力”，并声称“反对任何试图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的单方面行动”，“重申反对中国在南海的非法海洋权益主张和行动”。¹4 月，拜登总统与菅义伟首相举行首脑会谈，发表题为“新时代日美全球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提出“日美两国要重新建立作为印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和平安全基础的日美同盟”“日美同盟要塑造自由开放

¹ 日米安全保障協議委員會（日米「2+2」）、https://www.mofa.go.jp/mofaj/na/st/page1_000942.html。

的印度太平洋”。美方再次重申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第五条，高调展示日美同盟的牢固性及两国对印太地区的“承诺”。¹在 2022 年 1 月的日美“2+2”会议联合声明中称，“日美同盟在直面各种安全问题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重要”。

在强化日美同盟的同时，日本还强化“四边机制”安全合作。2021 年 3 月，美日澳印四国举行“四边机制”确立以来的首次线上首脑峰会，展现了对“印太战略”的“坚定承诺”及对继续推动“四方安全对话”的积极姿态；9 月，美日澳印在美国白宫举行首脑峰会，讨论新冠疫情、海洋安全、网络安全等问题，重申共同建设“自由开放、包容性强”的印太地区。虽然两次峰会并未直接提及中国，但议题多与中国有关或围绕中国进行。联合制衡中国崛起是“四边机制”的主要目标之一，当前重点在于牵制中国海上力量的拓展和后疫情时代中国影响力的提升。

日本还加强与美盟国家、伙伴国家的安全合作，不断扩大“防卫朋友圈”。日澳于 2021 年 6 月举行“2+2”会议，将澳列入日本“武器等防护”名单，澳成为继美之后第二个列入该名单的国家。2022 年 1 月，日澳两国签署了部队《互惠准入协定》（RAA），这是继《日美地位协定》后日本首次签署同类协定，意味着日澳基本确立了准同盟关系。日印通过安全磋商、军事演训、签订《物资与劳务相互提供协定》，达到了准同盟关系状态。日本还与英、法等国加强安全合作，并积极推动缔结日英、日法《互惠准入协定》。此外，还与越、菲等东盟国家强化军事安全合作。2021 年 9 月日本与越南签署《防卫装备技术转让协定》，岸信夫防卫大臣称日越防卫合作进入“新阶段”。7 月，日本航空自卫队与菲空军在菲克拉克空军基地举行首次空空联合演练，日方称此次演练是为了与菲律宾分享人道援助和救灾经验，是日菲两国防务合作的“重大里程碑”。²

总体看，2021 年日本在安全领域继续推动军事安全政策调整转型，着力建设“多域联合防卫力量”，进一步提升自主防卫能力，同时继续强化日美军事同盟，深化拓展多边安全合作。对华安全政策趋于强硬，在台湾问题上高调选边站队，成为日本对华安全政策的最大负面动向。

¹ 日米首脑共同声明「新たな時代における日米グローバル・パートナーシップ」、<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202832.pdf>。

² 《外媒：菲日首次双边空空演练》，<https://m.gmw.cn/baijia/2021-07/10/1302398243.html>。

日方学者点评

一、川岛真 教授

在军事安保领域，可能中日双方的认识最为不同。中方认为日本跟着美国，推动军扩，建立军事安保的“小圈子”。但是，日方认为因为中国一直都扩大军事力量，给周边国家的压力也一直强化，所以为了维持状况，日本也不得不提高防卫能力的同时，找美国和其他的同盟国建立军事安保的网路。中方认为美国和其同盟国改变“现状”，日本认为中国破坏“现状”。所以双方指责对方有对区域安保环境不安化之事。

此文基本上站在中方的立场来批判日本的军事政策。可以理解中方有这种看法，但是补充一些论点。

第一，目前，日本的“专守防卫”面临一些新问题，特别是战争的混合化(hybrid)影响了日本“专守防卫”的想法。尤其是越来越关注灰色地带(grey zone)的防卫。最近，中方关于“智能化战争”的议论，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第二，从日本的观点来说，2021年中国海警在尖阁诸岛（钓鱼岛）附近的活动依然很活跃。还有前面言及的中国和俄罗斯的联合海军舰队航行津轻海峡，虽然没有违反国际公法，但是透过电视的画面，给日本观众留下了特别强烈的“中国威胁”之印象。

第三，有关台湾问题。2021年4月，菅义伟前首相访美的时候，与拜登总统发表的共同声明中提到“台湾海峡的和平和安全”，引起了中方的关注。日本媒体也报道了1969年佐藤荣作-尼克松首脑会谈以来，实际上2005年的日美2+2也用过这一说法，小泉纯一郎担任首相期间与美国高官赖斯会谈的时候也用过。对于日本的外交来说，近年经常用过的说法，并不意味着日本政府采用了对台湾海峡的新的政策。还有，自民党-民进党之间的交流，以及安倍的发言等，日方认为除了一些意外发言之外，大部分都在1972年体制范围之内。

二、青山瑠妙 教授

本章从提升自卫能力、强化日美同盟、发展多边安全合作三个方面来分析日

本的军事动向，可谓是准确地捕捉到了日本安全政策的现状。

本章对于防卫研究所发行的《东亚战略概要》、日本《防卫白皮书》、《外交蓝皮书》、《海上安保报告（海上安保白皮书）》、《中国安全报告》（防卫研究所）等日本政府和防卫研究机构发行的刊物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同时，本章还基于日本战略大纲和安全保障战略，对日本的军事能力实际状况、以及加强与美国等其他国家的安全合作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整章内容基调客观，以事实为基础的分析准确地捕捉到了日本的现实。如果能够基于这样的分析，再对日本参加“五眼联盟”的可能性等当下日本正在讨论的问题给出意见，本章将会更加具有启发性。

专题五

2021：新冠疫情中呈暖色调的中日经贸关系

2020年初在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的情况下，中日经贸关系仍基本上保持了稳定发展的态势。进入2021年，在各国政府的积极努力下，特别是新冠疫苗研发成功并不断提升接种率，各国经济逐步向好。在此情境下，中日两国经贸关系恢复并保持了继续向好的发展势头，但干扰因素不断出现，因此，2021年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可谓逆风前行。未来，如果干扰因素持续不断，将可能给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蒙上一层阴影。

一、快速恢复发展的中日经贸关系

由于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各国经济以及对外贸易遭受重创。进入2021年，在各国的艰难努力下，经济贸易逐步恢复，作为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与日本的经贸关系在两国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快速恢复并实现了较大增长，这从中方与日方的统计数据中均可以看到。据中方统计，2021年，两国贸易额为3714.0亿美元，同比增长17.1%，时隔10年再创历史新高。其中，中国对日出口1658.5亿美元，从日本进口2055.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6.3%和17.7%，中国对日贸易逆差397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第二大出口对象国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国。据日本银行贸易统计速报显示，中日贸易额2021年实现快速增长，全年贸易额为38.34万亿日元，同比增长17.75%。其中，日本对华出口17.98万亿日元，从中国进口20.35万亿日元，同比分别增长19.2%和16.2%，日本对华贸易逆差2.37万亿日元。

由于疫情重创世界经济，产业链供应链受到巨大冲击，加上2021年以石油天然气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对以出口为导向的日本经济影响巨大，2021年，日本对外贸易额为166.19万亿日元，同比大幅增长，但贸易逆差达到1.47万亿日元，仅次于2019年出现的对外贸易逆差。中日贸易恢复增长对日本对外贸易贡献巨大，在日本对外贸易中，中国继续保持第一大贸易伙伴和出口市

场地位。

投资方面，虽然疫情仍在影响世界经济，但中国采取积极对策，有效控制疫情，投资环境持续向好，日本企业对华投资恢复增长。据统计，2021年，日本对华新设立企业超过900家，同比大幅增长两成以上，实际使用金额超过30亿美元，同比有较大幅度增长。截至2021年底，日本累计在华设立投资企业约5.4万家，实际使用金额超过1200亿美元，在中国利用外资总额国别排名中继续位居首位。中国企业对日投资持续增加，2021年，中国对日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8亿美元，在日本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超过4亿美元。向日本派遣技能实习生不足6000人，同比大幅下降。

可见，中日经贸关系在全球疫情仍在持续发展蔓延中实现快速增长，实属不易。但是，必须看到，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的环境并未同步向好，影响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的不利因素持续出现。

二、中日经贸关系发展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增加

进入2021年，特别是拜登当选美国总统以后，日本对华动向逐步发生变化，这对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构成巨大挑战。2020年9月菅义伟当选日本首相以后，在对华政策方面基本上延续了安倍政府的对华政策。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后，继续采取围堵打压中国的战略，但做法上明显与特朗普政府不同，即拜登政府以共同价值观等积极修复与传统盟友的关系，力图构建围堵中国的“统一战线”。日本政府则表现出配合拜登政府遏制中国的明显意图。譬如美国为打压中国，不仅对华发动贸易战、科技战等，还以人权等名义干涉中国内政。同样，日本在涉台、涉港、涉疆、南海、钓鱼岛等一系列问题上也配合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此外，日本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仍具有很大不确定性。2022年1月22日首次超过5万例，连续五天创下日增最高纪录，且目前传播病毒以奥密克戎毒株为主，传播非常迅速。日本政府已经采取对策防止疫情进一步恶化，但效果如何还不得而知，对正在恢复发展的中日经贸关系的影响仍不可低估。

当然，在看到这些可能影响中日经贸关系的不利或不确定因素的同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如期顺利生效，对未来中日经贸关系的持续发展仍是一个重大利好。

三、对中日经贸关系的影响

虽然日本政府在日美同盟框架下所采取的一系列干涉中国内政的动作，暂时还未对中日两国经贸关系产生重大负面影响。但从 2012 年日本“购岛事件”的教训来看，中日两国经贸关系能否顺利发展值得关注。

首先在两国双边经贸关系方面，2020 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和冲击，中日经贸关系受到很大影响，尽管如此，进入下半年以后，中日两国贸易逐步恢复，且 2020 年日本能够实现贸易增长，关键是中日贸易保持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进入 2021 年，日本政府持续干涉中国内政的一系列错误做法，对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的良好环境构成负面效应；而 2012 年中日因政治关系陷入低谷从而对两国的经贸关系构成较大冲击，贸易投资连续多年走低可以说是前车之鉴。如果日本政府仍采取这种态度，中日两国经贸关系不能不受到影响。

其次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RCEP 签署很大程度上是中日两国共同努力的结果，2022 年 1 月 1 日，RCEP 已经正式生效。根据协定，各国将陆续开展减税安排，中日将逐步实施并落实两国在 RCEP 中的承诺，这对保持中日经贸关系发展将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 RCEP 的签署为中日韩 FTA 谈判提供了新的助力，有助于中日韩加快谈判进程。但如果中日两国政治关系持续走低的话，必然影响到以 RCEP 为核心的区域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最后在中日产业链、供应链方面，经过多年发展，中日已经建立起符合市场发展规律的比较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但是，美国对华围堵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与中国产业脱钩。为此，美国也要求日本等盟友采取类似做法，这必然会对中日的产业链、供应链产生不利影响。新冠疫情既让日本进一步认识到调整产业布局的必要性，也让日本调整中日产业链、供应链的动力增强，新冠疫情爆发后日本出台的政策已经体现出这一点。同时，还必须看到，美国对日本企业的压力不容忽视，在金融、科技以及美国经常实施的“长臂管辖权”方面，日本在华投资企业会比较担心和顾忌。因此，中日产业链、供应链短期内无忧，但从中长期看，日本企业特别是面向欧美的企业，其调整产业链、供应链的动向值得关注。

中日经贸关系能取得现在的成就非常不易，既是中日两国政府及工商界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也说明中日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符合两国利益。展望未来，RCEP 如期生效为中日经贸关系进一步向好发展提供了新动力，其波及效应将促

进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但是，也必须看到国际环境特别是日方的不和谐动作给中日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中日两国应该保持清醒认识，管控分歧，充分利用 RCEP 生效后带来的机遇，共同推动两国经贸关系持续健康发展，不断造福两国人民！

日方学者点评

一、 川岛真 教授

经济是中日关系最重要的正面基础，6 成以上的日本人认为中日关系对日本重要之理由也是经济。202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的相关活动，也应该以经济领域为重心。目前，日中社会经济有不少共同课题和共同利益，双方应该找出“共同”的部分，推动“合作”。另外，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是日本的三倍，今后差距还会一直拉大。中国的科技力量也提高了，目前中日之间的互补性还看得见，但是将来中国的科技力量在不少领域会超越日本。中国经济对日本的重要性，可能今后一直都会提高。

2021 年，需要恢复经济的日本经济界对中国市场有很大期待，日本媒体也关注中国的双循环政策和共同富裕政策、数字基础设施（digital infrastructure）建设等。日本经济界也在这些新的政策中，找出可能合作的契机。

但是，目前还有一些问题给日中经济关系带来负面影响。首先，是经济安保，特别是美国所推动的脱钩（decoupling）政策。目前，岸田政府策划经济安保法律，如果这一法律太严厉，或者没有充分考虑经济关系现实的话，对今后的日中经贸关系将给予负面影响。

第二，中澳之间的贸易问题等给日本经济界负面印象的可能性。近年，中国对台湾的农产品、澳大利亚的葡萄酒等采取比较严格的措施，日本经济界对此也给予特别关注。如果中国的这种措施为一种风险（risk），那么日本经济界会把对中国的（投资等）采取“淡出”措施。

第三，RCEP 是日中经贸合作的新平台，今后日中两国可以借助这一新平台推动各种合作，策划新的标准和规则。中国对 CPTPP 的加盟申请，也对日中两国提供了新的对话平台。但是，对这些新的平台可能变成双方对立的平台之忧虑也存在，因为在新的平台上的“合作”的难度会更高，达不成共识的话，反而有产生争执的可能性。

二、青山瑠妙 教授

本章对于在新冠疫情灾难之下依然表现出持续发展态势的中日经济关系进行了肯定,并指出日本追随美国的对华政策和新冠疫情的影响是潜藏于中日经济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至于对未来的展望,本章指出,RCEP可以促进中日经济关系,但如果日本不改变对华政策,将会对中日经济关系产生不良影响。同时,本章还警告说,美国的影响力将对目前已经建立起来的日中之间基于市场经济的供应链产生负面影响。

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下,日本的确出现了暂时的脱钩论。然而,当今经济的攻防战主要局限于“敏感技术”。“敏感技术管理”是经济安全的主旋律。从这个意义上,可以预见,未来中日经济关系将继续发展。另一方面,未来需要关注“敏感技术管理”脱钩对中日经济的影响。

专题六

以 RCEP 为契机推进更高水平的互惠型国际经贸合作

2022 年 1 月 1 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协定对已提交核准书的 10 国正式生效。作为目前世界上参与人口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经贸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RCEP 的生效实施将有效推动区域经贸合作和增长。首先在贸易领域,已核准成员国间 90% 以上货物贸易的关税将分阶段降为零,在服务贸易方面的开放承诺也高于原“东盟‘10+1’”自贸协定水平。其次在投资领域,增加了承诺最惠国待遇、禁止业绩要求、采用负面清单模式做出非服务贸易领域市场准入承诺并适用棘轮机制等内容。这标志着东亚地区以价值链分工为基础的生产体系从多年以来的事实上一体化,进入了制度一体化的新阶段。此外,RCEP 在电子商务、数字经济等领域也有所突破,为中国和其他 RCEP 成员国进一步参与更高水平的新一代国际经贸协定提供了实验场所和机会。其中,中日韩三国通过 RCEP 间接形成了自由贸易伙伴关系,经贸合作的经济效果较为突出,为下一步签订更高标准的中日韩 FTA 搭起了平台。

与 WTO 框架相比较,RCEP 在减免关税以及推动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等相关的边境规则方面已经做出了较大幅度的改善,但与新一代国际经贸协定中所强调的关于竞争政策、国有企业、政府采购以及劳工标准等边境后规则之间还有较大的距离。在当前已生效的新一代区域贸易协定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由日本主导的 CPTPP。作为一个开放程度更高、涵盖领域广、参与国家多、地域范围大的区域性自贸协定,CPTPP 在多个方面代表了国际经贸规则的发展方向。

中国经济加盟 WTO 后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然而近年来随着国内改革步入深水区,以及面临国际环境的剧烈变化和国际分工的调整,宏观经济增长的下行趋势越来越明显,加大力度推进制度性改革迫在眉睫。CPTPP 框架比 RCEP 更强调边境后规则,这些条框聚焦于实现公平竞争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一致。因此中国是否能够以 RCEP 为契机,积极尝试对接 CPTPP 规则中的边境后条款以开放促改革,并与日本合作打造更高标准的新型经贸合作关

系，不仅关系到中国经济自身的发展，也将对日本经济以及区域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下行风险

从日本、韩国等国家过去的经验来看，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持续保持增长是可以实现的。中国人均 GDP 在 2012 年已达到了 1 万美元，但之后的上升趋势明显减弱。¹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可以概略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加盟 WTO 后中国以全球价值链方式参与国际分工，如今制造业在全球的占比已经处于高位，出口驱动力持续下降。制造业对就业的需求趋于减弱。同时由于存在诸多干扰公平竞争的制度因素，导致市场的新陈代谢功能不健全，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重新配置效果不佳。

其次，依靠增加资本投入来推动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主要原因，一是劳动力年龄结构问题。随着中国老龄化速度加快，储蓄率已开始进入下行通道；二是投入过剩导致的债务积累问题日益深刻，企业投资的增加已经开始呈现出趋势性的下降。

第三，研发能力和投入力度不足。对国有企业的补贴等优惠政策，并没有有效地促进其研发投入和创新的增加，导致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处于中低端环节，高端递进和产业升级难度较大。

第四，生产性服务的 ICT 资产的投入与美日等发达国家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阻碍 ICT 资产增加的原因：一是高端技术和产品高度依赖发达国家，面临日趋深刻知识产权摩擦问题；二是对 ICT 的外资进入有较强的限制，设定了较高的准入门槛。

此外，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是农业大国，粮食安全问题以及三农问题迄今尚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与其他行业相比较，农业的生产力上升较为缓慢和滞后。国内的劳动权益保障、寻租腐败等制度性改革滞后所导致的社会矛盾日益深刻。而来自于国际的针对知识产权保护、原产地规则、政府采购以及以非关税壁垒为由的经贸摩擦也愈加频繁。

上述诸多因素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的下行风险增大，这将对与中国经济之间具

¹ 基于购买力平价（PPP）调整后的国际美元。

有较强互补关系的日本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先行研究的模拟结果显示，当中国经济宏观增长率下降或投资力度趋弱，会直接导致日本的就业需求下降，尤其是日本在东亚地区价值链分工中具有比较优势的金属材料、电子通讯设备、通用机械以及设备租赁等行业受影响较大。¹这种影响甚至可能会抵消一部分日本经济在 RCEP 和 CPTPP 框架下所能获得的利益。

二、RCEP/CPTPP 对中日经济的影响

当前的 RCEP 框架对于区域经济以及中日韩等国别经济发展都将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从 RCEP 生效后的经济效果来看，区域内的贸易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中日韩三国的国民经济收入也将有所增加。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估算，与没有 RCEP 的情形相比较，2030 年日本的 GDP 将上升 0.69% 为获益最多，其次是韩国 0.24%，而中国仅为 0.13%，位列第三，显然 RCEP 对中国经济的驱动力度是不够的。²

本文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理论和全球贸易分析模型 GTAP 软件，模拟测算了 RCEP/CPTPP 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测算结果显示，中国若在 RCEP 基础上再加入 CPTPP，国民收入的增加要比仅在当前的 RCEP 框架下高出 50% 以上，而同时日本和韩国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反之中国若被排除在 CPTPP 之外，在累积原产地规则和区域内高水平贸易自由化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出口产品的部分国际市场份额将遭到 CPTPP 缔约方挤出，进而对国民收入和总产出形成负的冲击。同时，模拟结果还显示，RCEP 生效后，中国的进出口都将大幅度增加，进口增幅略大于出口，中国贸易顺差将有所缩小。而在 RCEP 基础上中国如能加入 CPTPP，进口增幅远远大于出口增幅，贸易顺差比 RCEP 进一步缩小。这主要源于日本等在电子信息产业、金属材料、机器设备制造等领域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在公平竞争、市场准入规则、知识产权保护以及零关税的背景下将大大提升相关外国产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扩大中国的进口需求。这将有助于适度调节中国经常账户的长期高额顺差，缓解国际贸易摩擦，与缔约方实现互利共赢的互惠型经贸合作关系。

¹ Fukao Kyoji and Tangjun Yuan, "China's Growth Slowdown: Lessons from Japan's Experience and the Expected Impact on Japan, the USA and Germany," *China & World Economy*, Vol. 24, Issue 5, pp. 122-146.

² 熊谷聡、早川和伸「地域的な包括的経済連携 (RCEP) 協定の経済効果: IDE-GSM (による分析)、IDE-JETRO アジ研ポリシー・ブリーフ、No. 143、2021 年。

可见与 RCEP 相比较，CPTPP 框架更有利中日双方经济的发展。尽管中国在短期内加入 CPTPP 尚存诸多较高的门槛，然而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入世”经验表明，申请加入一个自身暂时无法满足标准的协定，为接近和满足其标准，在加入前的谈判过程本身就是中国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而在加入后为实现承诺，也是中国不断完善自身法律法规、政策和相关措施的过程。事实上，中国入世后，不仅实现了自身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也推动了亚洲区域内价值链分工和生产网络的形成，并以“中国特需”的方式为日本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三、高水平经贸规则下的中日经贸互惠合作

中日间的经贸合作方式主要有进出口贸易、跨境投资以及跨境业务合作。CPTPP 条款在不同章节制定了进出口贸易相关规则，涉及到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原产地规则、海关监管、贸易救济、跨境服务贸易、金融服务、电子商务等内容。同时为最大程度促进了各国之间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保障公平竞争，对投资、竞争政策、监管以及争端解决等内容也进行了规定。此外也还对跨境合作设定了合作与能力建设的相关规则。对标和遵守这些规则，不仅是中日间经贸关系高水平发展的要求，同时也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开放提供了参考的标准和目标。

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要不断优化市场竞争环境，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在经济学概念中体现为如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TFP），既包括资本和劳动要素质量的提升和有效配置，也包括制度改革、公平竞争、人力资本、知识技术积累等综合投入要素的增加和有效配置，而其中制度改革最为关键难度也最大。与日本之间高水平的国际经贸合作可谓“破局”之道，可通过以下三条路径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1）CPTPP 规则中关于国有企业、市场准入、公平竞争、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等措施，可以促进健全市场的新陈代谢功能，通过实现各类生产要素从生产效率低下的部门向生产效率高的部门转移，提升 TFP 水平。在国际分工背景下，中间品零部件的投入也是主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国际分工模式的进一步推进也有利于资源再配置的调整。

（2）技术贸易壁垒、跨境投资、知识产权、电子商务、货物和服务贸易自

由便利化、数字跨境交易、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条款，则有利于增加知识和技术型资本的积累。在互联网、物联网等电子通讯技术普及的今天，该途径主要依靠电子通讯类资产（ICT）的增加、研发（R&D）的投入增加、人力资源的培育、市场准入以及无形资产——品牌建设等来实现。

（3）知识产权、劳工权益、服务贸易、电子商务等相关条款，有利于科技创新与技术交流和普及来推动 TFP 上升。主要途径体现在有序推进知识密集型劳动力培育，进而促进人口增长。同时也能增加国际间学术和技术交流，以及专业人才的跨境合作。

RCEP 倾向于通过边境措施来实现扩大市场准入以及推动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在促进中国对内的制度改革以及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路径和效果不够清晰。而新一代国际经贸协定则更强调边境后措施，因而能够更有效地促进中国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为建立新型的中日互惠型经贸关系提供制度保障。

综上所述，尽管 RCEP 吸取了国际上其他区域自贸协定的经验，在海关程序和贸易便利化、知识产权保护、贸易救济、电子商务、竞争、政府采购、中小企业和经济技术合作等广泛领域都达到了较高水平，可谓 WTO 的升级版，但与新一代国际经贸协定 CPTPP 相比较，在自由化水平和条款约束力等方面相对较低，因此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是有限的，进而也可能会影响到日本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利益。因此从中日经贸合作的中长期目标来看，RCEP 应作为中日双方向更高层级的经贸协定努力的起点和桥梁。

毋庸讳言，中国申请即刻加入 CPTPP 面临诸多门槛和障碍。比如：美墨加协定中的“毒丸条款”暗藏的不确定因素；中国较难接受的数据自由流动规则和劳工权益条款、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以及来自美国的压力影响等。如果中日双方有效利用 RCEP 生效实施所奠定的良好基础，共同努力适时启动中国加入 CPTPP 谈判，或在中日经贸合作中先行先试一些高于 RCEP 的规则，不仅可以让国际社会清楚地看到中国接纳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的决心和有效推动国内改革、形成更加自由开放市场的意愿和能力，也为中日双方共同探索实现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型互惠合作开启新的篇章。

日方学者点评

一、川岛真 教授

RCEP 是东亚最重要的经贸合作架构的同时，对中日两国来说，初次达成共识而成的 FTA，很期待 RCEP 发挥新的功能，成为中日两国之间的新“合作”平台。目前，世界经贸面临新的课题，特别是电子化的交易等新的领域出现，日本和中国是世界第三、第二经济大国，应该保持一些主导性，共同策划有关新领域的规则和秩序方案。如果中日两国也把欧美拉入协商过程的话，世界会产生新的经贸秩序。

有关 CPTPP，日本国内对中国的加盟申请有不少负面看法。但是我认为日本不应忽视中国的申请，应该与中国“沟通”。日本是 CPTPP 的原加盟国之一，如有要申请的国家的话，先听听申请国家的意见和看法。日本不可能因中国申请加入而更改 CPTPP 的标准，但作为原加盟国应该详细解明 CPTPP 的理念和规则，如果中国一时达不到规则标准的话，可以向中国提出改善的方案等。在中国有不少日本公司开展经济活动，它们经常面对不少问题。因此日本政府应该利用这一机会，尽量把作为在华外国企业的日本公司的声音传达给中国政府。

在 WTO 的功能被限制的现在，中日两国推动合作，摸索解决经济问题的新平台，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与冷战时期不同，世界有很密切的供应链，虽然一方面需要有经济安保的考虑，但是更需要创建新的经贸机制的努力。

二、青山瑠妙 教授

本章主要从中国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加入 CPTPP 对中国和世界都是双赢。

在全球化退潮的背景下，亚太地区继续推动经济一体化进程。RCEP 的生效和中国申请加入 CPTPP 无疑将进一步推进这一趋势。对于中国加入 CPTPP，日本普遍认为中国无法满足加入 CPTPP 的要求。日本认为中国不会在跨境数据传输自由和对国有企业补贴的问题上做出让步。但是可以预见，中国在这些领域展示出的决心和具体的改革措施，会使中国加入 CPTPP 的进程加速。

专题七

日本经济外交：重重挑战 审慎应对

2021年,《日本外交蓝皮书》提出了日本外交的七大重点领域,在2020年六大重点领域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而原有的一个重点“在制定新的共同规则中由日本发挥主导作用的经济外交”,则变为“在制定新规则的国际努力中占据主导”,隐去了“经济外交”的字眼。这是否意味着经济外交不再是日本外交的重点?在其整体布局中的存在感和影响力有所下降?答案或许恰恰相反。事实上,经济外交在日本外交中的地位不降反增,其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和拓展。正因如此,在该蓝皮书的主体部分,2021年经济外交首次作为独立的一章出现,命名为“增进国家利益和世界全体利益的经济外交”。在此之前,从2014年以议题分章开始直至2020年,这一章始终题为“增进国家利益和世界全体利益的外交”,“经济外交”只是其中的一节,与安全保障、国际合作、促进对日理解和信任等其他议题并列。

新的章节设置和措辞调整反映了核心内容及其重要性的微妙变化。在当前日本的语境下,“经济外交”所涉内容不仅包括与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相关的国际经济体系规则制定、国际会议的议程主导等相对宏观和综合的议题,也突出了扩大出口、促进基础设施海外拓展、资源外交、推动对日直接投资等具体的经济议题。这其中,资源外交等部分议题兼具紧迫性与延续性,在战后特别是石油危机以来始终是日本外交的重点关注对象。而在经济全球化深度调整、新冠肺炎疫情逡巡反复、区域和跨区域经济合作不断加深的背景下,近年来也出现了若干新变化和新趋势,以下分别从“人”“财”“物”的角度,以点带面,择其要点分述之。

一、“物”的交易：“进攻性农业”再上新的台阶

自第二次安倍政府以来,在促进农林水产品和食品出口方面,日本政府不断加大政策力度,其中又包含两个重要侧面。侧面之一在于晓以利害、步步为营,

对于与 3.11 东日本大地震特别是福岛第一核电站核事故相关的农林水产品和食品，通过外交协商等方式多管齐下，力争相关国家和地区放宽对于这些产品的进口限制，加速相关地区的灾后复苏和经济重建。

侧面之二在于借势发力、乘胜追击，重塑日本农林水产业的比较优势。2019 年 11 月，日本公布了《关于促进农林水产物与食品出口的法律》，2020 年 4 月 1 日这一法律正式实施。安倍政府曾提出，2020 年要将农林水产品和食品的出口额提高到一万亿日元。2020 年 3 月 31 日，日本内阁通过的《食物、农业、农村基本计划》又将这一数值到 2030 年的目标进一步提升至五万亿日元。为此，日本政府在海外的 58 个外交和派驻机构中设立了“支持日本企业的负责官员（负责食品产业）”，值得一提的是，仅在驻中国大使馆，这一负责官员就达到了四人，在所有外交和派驻机构中人数最多。

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的日臻成熟，新兴消费群体和消费热潮的兴起，全球物流网络的更新，跨境电商的蓬勃发展，这些因素都为日本农林水产业与时俱进、突破原有的窠臼创造了积极的条件。按照日本农林水产省发布的数据，2021 年日本农林水产品和食品的出口额同比增长 25.6%，达到 1.2385 万亿日元，其中面向中国的出口额最多，同比增长 35.2%，全年达到 2224 亿日元。随着“和食文化”在世界各国的传播，清酒、酱油、味噌等日本特色产品的出口都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例如，尽管国内的餐饮业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但“堤内损失堤外补”，日本酒的出口在 2021 年实现了连续第 12 个年份的增长，2021 年达到 401.78 亿日元的出口规模，威士忌的出口尤胜于日本酒。无怪乎在对 RCEP、日英 EPA 等新近生效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分析和报道中，除了汽车及零部件等产品之外，日本酒、烧酒、威士忌、扇贝等产品也往往被认为有望从出口扩大中极大收益，加以重点介绍。

不难看出，这两个侧面尽管攻守有别、侧重各异，但均有内政与外交、经济回报与非经济收益、危机应对与结构性调整相交织的特点，在新时期经济外交的谋划运作中具有颇为鲜明的典型意义。

二、“人”的流动：国境开放面临新的两难

根据日本总务省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发布的 2020 年人口普查确定值，日本

的总人口约 1.26 亿，比五年前减少约 94.86 万人，而其中劳动年龄人口（15-64 岁）约为 7508.8 万人，比五年前的上一次调查减少约 226.6 万人，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 59.5%，自 1950 年以来首次跌破六成。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萎缩反映了少子老龄化现象不断加剧。65 岁以上人口比五年前的调查增加 6.6%，达到历史峰值，而 14 岁以下人口则减少 5.8%，创下新低。

对此，近年来日本政府出台了各种应对措施，促进女性就业、提供全方面的育儿援助、推动“地方创生”、延长劳动年龄均是其中的代表。为了提升外来劳工的数量和质量，《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也进行了多次修订，例如，在 2014 年的修订中增设了“高级专业职务”的在留资格；在 2016 年的修订中增设了“介护”的在留资格；而在最新的 2018 年的修订中，增设了“特定技能 1 号”和“特定技能 2 号”的在留资格，前者是指在人才不足的产业中需要相当知识和经验的技能，涉及介护、农业、渔业等 14 个行业，后者则指需要熟练技能的工种，目前仅包括建筑、造船和船用工业等两个行业。根据 2021 年 9 月的最新统计，利用这些特定技能制度的外国人已经达到 38337 人，其中来自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最为突出。

然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这一日本社会长期面临、苦苦应对的人口问题雪上加霜。自疫情爆发以来，日本政府发布了数次“紧急事态宣言”和“防止蔓延重点措施”，餐饮、零售等行业受到致命影响，中小企业更是举步维艰。除了就业机会减少、贫富差距扩大、雇用状况恶化等直接后果之外，由于严格的入境政策，跨境的自然人流动骤减，境外游客、留学生、外来劳工等的入境人数都急速探底。例如，2021 年和 2020 年访问日本的游客分别为 24.6 万人和 411.6 万人，分别下降 94% 和 87.1%。而在 2020 年，整体的外国人入境人数比前一年减少约 86.2%，其中“短期滞在”“技能实习 1 号口”“留学”的下降人数最多，下降比例分别达到 87.9%、55.3% 和 59.1%。在即将公布的 2021 年的数据中，这一下降趋势或许将有增无减。

为了防止新冠肺炎疫情的失控蔓延，日本间歇性地处于“锁国”状态。在国内经济受到打击的同时，对外经济交往也处于十分受限的困境。对此，人手缺乏的中小企业、以经团联成员为代表的大型国际化企业等都已经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在过去，无论是经济全球化还是区域经济一体化，都表现为商品、技术、信息、

资本、人员等生产要素相对自由的跨境流动。在“人”“财”“物”等上述各种要素中，或许“人”的要素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最大，其负面的后遗作用也最为明显和持久。像不少国家一样，何时、以何种方式“开放国门”极大地考验着日本政府的政策魄力和平衡技巧。

三、“财”的转移：东芝与佳能案例的标本意义

2021年年中和年末，两家著名日本公司的异动一度成为新闻热点。2021年9月，东芝大连有限公司宣布将在月底停止生产，着手企业解散和清算手续，其生产基地将迁往越南或迁回日本。2022年1月初，针对解除劳动关系的员工，佳能珠海有限公司提供了异常优渥的补偿方案，又一次成为媒体报道和网络评论的焦点。

东芝大连和佳能珠海分别成立于1991年和1990年，两家公司背后的品牌均为改革开放以来中日两国经济合作的标志和典范，在中国民众中也颇具知晓率乃至美誉度。表面上看，两个新闻褒贬不一、反响各异：前者不免使人担心，日企“撤离中国”的步伐是否会加快，东芝的决定是否会产生示范效果，带动其他日企竞相效仿；后者则因“意外的善举”而备受赞誉，颇有悲喜交加、五味杂陈之感。事实上，两个事件都反映了日本企业全球产业链调整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结构变迁，新冠肺炎疫情只是进一步放大了这一转型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早在从大连撤退之前，东芝在2018年就提出了旨在改善收益、调整生产据点的“东芝Next计划”。佳能的经营困境则与其主营业务小型数码相机面临的智能手机竞争、芯片供应限制等因素息息相关。两个抉择背后反映了一系列共性的动因：现地经营成本持续攀升、全球同行竞争日益加剧、产品结构加速更新换代。

企业是国家间经济合作的核心主体和最终承接者。对外投资行为固然难以规避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但归根到底还是要商言商。一方面，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于2020年9月开展的调查显示，仅有7.2%的在华日资企业表示已经或正在考虑将生产基地迁出中国。正如大部分分析所指出的，日企“撤离”中国的速度和方式仍将是相对平稳和理性的。另一方面，从更大的背景来看，增强供应链韧性、减少对特定国家和地区的过度依赖可谓日本政府和企业的共识。日本政府已向企业开放了两次关于“供应链对策的国内投资促进事业”的申请，

分别批准 146 个和 151 个项目，补助金额接近 2478 亿和 2095 亿日元。企业经营终须“用脚投票”，何去何从值得拭目以待。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迎来五十周年、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即将完全终止的结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以及更宽泛意义上的中日经济合作也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一叶知秋，这不仅事关东亚两国，也是日本国家战略和经济外交动态调适的生动反映。

日方学者点评

一、川岛真 教授

2019 年末以来的疫情使世界各国必须调整自己的经济产业政策。之前，特别是发达国家采用了国际分工体制，对自己没有竞争能力的产业领域，由其他国家补充。但是，面对疫情，各国都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有口罩工厂、医疗制品的生产之地才可能保持国民的“安宁”和“安全”。

另外，疫情影响了人、物、财（钱）、信息的全球化，特别是人、物的全球化受到很大冲击。由于人的往来的限制，日本公司丧失了世界各地的很多商机，而且物的流通不顺导致了供应链的强韧性问题。特别是半导体材料等的缺乏，构成重大问题。

日本也不例外，经济产业省推动“供应链对策的国内投资促进事业”，确认批准了近 300 个相关项目，结果发现大部分的项目都与口罩等医疗制品有关。有一些项目是把在华高科技工厂移到东南亚等地方，目的地以越南为多，但总体来看数量并不多。

本文指出“进攻性农业”，日本期待中方逐步取消福岛等地的食品进口限制，也期待中国对日本稻米开放市场。在食品安全方面，中日双方都非常重视。虽然有福岛“处理水（中方说污染水）”问题，但妥当处理影响经贸合作的不利因素，尽量扩大合作空间，乃可取之道。

二、青山瑠妙 教授

本章是对日本经济领域动向的评论。本章从“人”“财”“物”三个角度讨论日本经济。正如本章所指出的，随着世界各地对“日本食品”的兴趣日益浓厚，日本农林水产相关食品的出口也在增加。日本在新冠疫情中的“锁国”政策造成了技术工人的短缺。本章还言及东芝大连公司和佳能珠海公司退出中国的动向，由此指出了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的结构变化。

近年来，日本开展积极的经济外交，这是谈及日本外交时的一个重要主题。对于资源稀缺的日本来说，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也是关乎日本经济存亡的一个重要

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会作为高标准贸易规则的推动者，缔结了欧盟-日本 EPA 和 CPTPP。对这些动向进行了解，将是今后推进中日关系的关键。

专题八

日本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与中日数字经济合作

相比中美，日本的数字经济发展处于被动落后的局面。在企业层面，日本几乎难以找出能与美国的谷歌、苹果、脸谱、亚马逊以及中国的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相竞争的数字巨头。在行政层面，日本政府推动的大量电子化、数字化项目进展迟缓。作为在电子和信息技术制造业方面的强国，日本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的被动落后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民众强烈的隐私保护意识，二是老龄少子化所带来的双刃剑影响。尽管严重的老龄化促使日本在智能制造和智慧服务方面引领创新，但少子化同时使日本整体社会趋向保守，勇于接受数字新生事物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数字产业的应用场景变得越来越有限。然而，即便如此，日本政府仍然充分认识到了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制定国际数字经济规则的战略意义。这也同时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学术问题，即本国数字产业发展相对有限的国家是否能够主导国际数字规则制定。

一、日本参与全球数字经济规则制定

首先，日本在区域贸易协定中涉及的数字规则，经历了从无纸化贸易到电子商务，再到更高水平的数字贸易协定的转变。在 2005 年前后日本与新加坡、菲律宾和泰国分别签署的双边贸易协定中，涉及的数字贸易规则主要集中在无纸化贸易。从 2009 年日本与瑞士的双边贸易协定开始出现了专门针对电子商务的数字贸易规则章节。此后在日本与澳大利亚、日本与蒙古的双边贸易协定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文本中都涉及电子商务规则，主要涉及数字产品的非歧视待遇、关税、国内监管法规、电子签名等内容。2018 年以来，随着《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以及日本与欧盟的贸易协定生效，涉及跨境数据流动、源代码、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的数字贸易规则正成为日本对外贸易谈判中的重点。2019 年，日本又同美国专门签署了《美日数字贸易

协定》，并在 2020 年与英国签署的贸易协定中专门设置了数字贸易条款，旨在打造更高水平的数字贸易规则。

其次，日本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的多边数字贸易治理，在多边或小多边层面构建数字经济治理联盟。2016—2019 年期间，日本向 WTO 共提交了 16 项与数字贸易相关的提案。2018 年，日美欧三边贸易部长会议开始寻求在数字贸易和电子商务领域达成共识，并呼吁更多 WTO 成员参与高标准规则。2019 年 1 月，日本与中美欧等其他 75 个 WTO 成员共同签署《关于电子商务的联合声明》，宣布启动 WTO 电子商务谈判。与此同时，日本政府提出“数据在可信任条件下自由流动”（DFFT）原则，并借助担任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的契机与中、美等国家共同签署了《大阪数字经济宣言》。

第三，日本并不满足于仅仅参与数字贸易规则的讨论，而是谋求主导全球数字经济规则的制定。在多边层面，一是积极主张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开展包括数字基础设施以及相关技术在内的援助，旨在通过缩小数字鸿沟，尽快使发展中国家能够接入全球数字经济活动，进而扩大日本的全球数字贸易市场。二是消除阻碍数字贸易发展的各种壁垒，包括“公开政府数据”“国内监管法规的协调”等，从而使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接受高水平数字贸易规则。在双边层面，日本一方面通过与欧盟互认“白名单”使自身在个人隐私数据保护方面达到全球领先水平，另一方面通过与美国签订数字贸易协定，在数字贸易自由化方面与美国保持一致，从而在全球数字经济规则的制定方面占据话语权和影响力。

二、日本在数字规则中的关注焦点

其一，数字知识产权保护。尽管日本并未发展出巨无霸型的数字经济跨国企业，但日本政府始终认为对数字知识产权的保护是维护其电子和信息技术制造业及服务业占据全球优势地位的关键。日本的主张主要包括：一是禁止强制开源代码和算法。在日本看来，外国政府强制披露源代码和算法的行为会使日本企业面临泄露商业机密的风险，并有可能被作为一种数字贸易壁垒来使用，不利于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二是禁止政府通过不正当程序获取数字知识产权。日本认为，由于部分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对数字知识产权的立法保护不够完善，政府部门可能市场准入、竞标、审查等各个环节通过不正当的程序获取日本企业的数字知识

产权，侵犯企业的利益，甚至危及日本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需要指出的是，数字安全对每个国家来说都至关重要，数字安全问题是泛在的，没有哪个国家的数字产品或服务享有绝对的安全或不安全。因此，在一国引入外国数字产品或服务的过程中都会有必要的审查机制。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源代码和算法的复杂程度也在进一步增加。这些都给客观公正地裁决数字知识产权纠纷带来了挑战。

其二，数据隐私保护与跨境数据流动。在数据隐私保护方面，日本社会具有十分普遍的个人隐私保护意识。早在 2003 年日本就通过了《个人信息保护法》，首次修订后于 2017 年 5 月 30 日全面生效，并于 2020 年 3 月 10 日再次修订。2018 年 7 月，在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生效两个月后，日本和欧盟就签署了《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该协定允许日本和欧盟之间共享个人数据，而无需额外的安全检查。这意味着日本和欧盟互相承认对方的数据保护制度为个人数据提供了充分的保护。在跨境数据流动方面，日本在 CPTPP 中明确提出主张数据跨境自由流动，禁止数据服务器设置于国内的限制，但如果是出于公共政策目的可以除外。尽管还有个别保留，但日本在积极推动数据跨境自由流动的大方向上与美国并无二致。通过与美欧协调一致，日本在确保自身融入美西方数字市场与规则联盟的同时，也能够利用相关高标准打开数字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大门，从而有利于本国企业发挥优势。但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过分严苛的数据安全标准可能扼杀其数字经济活力，过于自由的数据出境原则也可能损害其国家安全。

其三，公开政府数据及公平的数字贸易环境。在公开政府数据方面，发达国家普遍认为将特定政府数据（如公共交通、防灾、疾控等）共享给企业有助于促进数字创新和数字贸易，并反哺于更加高效的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在《美墨加协定》和《日美数字贸易协定》中都已经纳入了公开政府数据的条款。日本在给 WTO 的提案中进一步指出，政府在公开数据时应对外内外企业一视同仁，差别对待会成为阻碍外国企业进入本国市场的数字壁垒，不利于公平的贸易环境。除此之外，日本要求进一步改善电子商务或数字贸易相关服务中的市场准入承诺。通过促进国内外企业对数字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消弭数字鸿沟，为相关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提供更多的增长机遇，并鼓励更加公平的营商环境。需要指出的是，公平的贸易环境并非数字经济领域所独有的问题，其他经贸投资领域都普遍存在。

相比之下，公开政府数据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更具压迫力的要求。许多国家的公共治理体系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很可能并不具备系统性的政府数据库，也可能还无法认识和识别什么是敏感数据，什么是可共享的数据。轻易向外国企业开放政府数据很可能带来较大的风险和挑战。

三、中日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展望

首先，由于中日发展程度不一，双方在一些数字规则的核心问题上存在分歧。从全球数字规则的制定来看，美国和欧盟的主张及实践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欧盟通过《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构筑了号称史上最为严格的数据隐私保护规则，有可能成为一种变相的数字贸易壁垒。美国凭借其在数字技术和企业方面的巨大优势力推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并以意识形态划线构筑数字联盟，具有进攻性色彩。日本则通过与美欧在高水平数字贸易规则方面协调一致，已经融入美西方发达国家的数字市场和数字规则联盟。由于发展程度不一，加之大国博弈的影响，中日在跨境数据流动、公开政府数据、相关市场准入等方面的分歧在所难免。

其次，中日两国应当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寻求双方数字利益最大化的公约数。从长远来看，中日两国发展数字经济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把握数字技术革命的浪潮，推动科技向善，引领全人类迈向数字文明新形态。从短期来看，全球新冠疫情反复延宕，为各国加速数字化转型，发展数字经济提供了机遇。尽管存在分歧，中日在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加强第三方市场合作方面仍然拥有广阔的合作前景。双方还可以在智慧城市建设和数字抗疫等公共服务领域开展更多的交流与合作。此外，网络安全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保障也是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过去十年里，中日鲜有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出现重大纠纷。但就在去年，日本也出现了追随美国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对中国采取“污名化”的现象。中日应在网络安全方面保持战略沟通，增信释疑，共同引领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治理，为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保驾护航。

再次，中日两国应当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抓手，打造弹性数据监管的最佳实践案例。RCEP是当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也是中日之间首次建立直接的自贸区关系，意义重大。与CPTPP相比，RCEP在跨境数据流动规则方面采用的是弹性数据监管模

式，在鼓励跨境数据流动的同时保留退出机制。日本在 CPTPP 相关条款中也保留了公共目的除外的条款，尽管尚未言明这种公共目的究竟指什么情况。由此看来，中日两国对于数据自由流动可能会带来安全风险有着共同的认识和预期。中日两国应当携手打造 RCEP 在弹性数据监管方面的最佳实践案例，从而有利于在双边层面加强对彼此数字经济战略的理解和认识，在多边层面为争取更加折中、平衡的数字贸易规则奠定基础。

日方学者点评

一、川岛真 教授

此领域是中日之间新的合作领域，此文对 RCEP 和 CPTPP 之间在这一领域的不同点的解读也很准确。CPTPP 早就不适应数字经济的现实，需要更新内容。RCEP 的内容是较新和有弹性的，虽然欧美不在其中，但 RCEP 可能成为数字经济的新秩序形成之重要平台。而在此平台，中日两国的角色特别重要。

此文指出，“日本也出现了追随美国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对中国采取‘污名化’的现象”。其实，数字经济新秩序的形成是世界关注的新问题，虽然美国不一定希望日中主导新秩序的形成，但日中在 RCEP 平台进行数字经济相关的合作就可以了。日本可能把 RCEP 合作状况报告给美国，如果能把美国也拉进来的话，那么对更有效的数字经济秩序的形成还是有利的。如果美国完全反对日本在此领域与中国合作，那么 RCEP 平台完全由中国主导，恐怕也是美国不愿看到的。

二、青山瑠妙教授

如上所述，2021 年度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中日关系报告》涵盖了中日关系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客观分析，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

总体而言，与之前相比，2021 年度的《中日关系报告》对中日关系现状和未来的看法较为悲观，对日本的外交政策持有批判态度。希望在今年中日两国政府的努力下，2022 年的报告书能够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对中日关系进行描绘。

四、附 录

(一) 课题组成员简介与分工

- 胡令远：**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教授；研究领域：中日关系、文化·文明与国际政治；课题组协调人、总论一、统稿。
- 川岛真：** 东京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中日关系、国际政治；课题组协调人。
- 臧志军：**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日本政治、中日关系；总论一，统稿。
- 加茂具树：** 庆应义塾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中日关系、中国政治。
- 青山瑠妙：** 早稻田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中日关系、中国外交。
- 汪鸿祥：** 创价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中日关系，日本政治；专题一。
- 江新风：** 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研究领域：日本安全保障、中日关系；专题四。
- 宋志勇：**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研究领域：中日经贸关系、日本经济；专题五。
- 包霞琴：**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日本外交、中日关系；专题三。
- 张云：** 日本新潟大学副教授；研究领域：日本政治外交、中日关系；专题三。
- 袁堂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日本经济、中日经济关系；专题六。
- 高兰：**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教授；研究领域：日本外交、中日关系；总论二。

- 贺平：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教授；研究领域：
国际政治经济学、区域经济合作；专题七。
- 王广涛：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领域：
日本政治、外交；专题二。
- 江天骄：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青年副研究员；研究领域：国家安全
与数字治理；专题八。

（二）几点说明

- 1、年度报告书系列之版权属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如有引用，
请务必注明出处。
- 2、年度报告书系列均载于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网站
(<http://www.jsc.fudan.edu.cn>)。
- 3、本报告书川岛真教授所撰部分由本人用中文撰写，加茂具树教授
所撰部分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宋晓煜老师翻译，青山瑠妙教授所撰
部分由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博士后王天然翻译。
- 4、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服务中心孙超老师、课题组秘书王
范卿参与了本课题报告的统筹和相关事务。
- 5、对报告书如有垂询，请与课题组负责人胡令远教授联系：
lyh@fudan.edu.cn。

复旦大学中日关系（年度）战略报告书

课题组

2022年2月